

# 鴉片、鬼兵、珠海老漁：晚清廣東詩人張維屏 鴉片戰爭期間所作詩管窺

嚴志雄\*

## 一、前言

十九世紀，歐美的政治、經濟勢力擴張到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中國也不得不在某一程度上直面這些被它蔑稱為「夷」的「他者」(the other)。表面上看，清朝的文治武功在十八世紀晚期臻於鼎盛，但其實已百病叢生，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清帝國迅速走向衰亡，此中最明顯的徵象，就是屢被英法等國擊敗。中國與列強的衝突，最常發生在廣州——華南的貿易港和粵東省會。攤開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在導論性質的三章後，赫然就是「廣州貿易和鴉片戰爭」，可見在中國近代史的舞臺上，廣州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十九世紀初，中國東南的財富中心開始從江南轉移到公行所在的廣州；清朝的邊患也從亞洲腹地轉移到東南沿海。廣州變得重要起來，它不僅是清廷(尤其是內務府)的財源，也是中國戰略防禦的前沿。<sup>1</sup>

本文將探論晚清廣東詩人張維屏(1780–1859)創作於兩次鴉片戰爭期間的詩篇。十九世紀的鴉片貿易非常複雜，史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指出：「伴隨英屬亞洲殖民地的誕生而誕生且一直持續到印度獨立運動的二十年代，泛十九世紀的鴉片貿易可以看作是一種網羅了印度農民、英國與印度政府、廣大

---

本文為香港中文大學 Research Committee Funding for Research Sustainability of Major RGC Funding Schemes 所資助之“Nineteenth-Century Cantonese Literati and Their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Before and After the Opium War”(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前後廣東文人對中西文化的態度變化——兼論清代廣東本土菁英文化景觀的轉變)研究計劃部分研究成果。承蒙審查委員惠賜中肯的評價及修改意見，筆者獲益良多，謹致謝忱。

\* 嚴志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sup>1</sup> 參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劉廣京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上卷，頁152。

的中國消費者、大批西方人、帕西人、西班牙系猶太人以及大部分中國商人這樣一個巨大的稅收體系的跨國合作機構。」<sup>2</sup>張維屏在當時未必知道那麼多，但中英因鴉片問題交戰時，他在現場，在一定意義上，是歷史的見證者 (witness)。

張維屏，字子樹，號南山、松心子，晚號珠海老漁，廣東番禺人。生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歿於咸豐九年(1859)，閱歷四朝，晚年刻一印，文曰：「乾隆秀才，嘉慶舉人，道光進士，咸豐老漁」，<sup>3</sup>頗妙。張氏才學，早歲即聞名鄉里，而舉業並不順遂，二十五歲鄉試中式後，五度赴京會試，均不售，至四十三歲時始中進士。官運亦不亨通，曾自嘲「十載以來，四為縣令」，於道光十六年(1836)五十七歲時辭官返里，時任南康府知府。<sup>4</sup>張氏詩名則早譽滿南北，「年三十，所作已卓然成家，海內名流甚器重之。嘉慶九年舉人，至都，大興翁方綱曰：『詩壇大敵至矣！』……其詩出入漢、魏、唐、宋諸大家，取才富而醞釀深，論者謂為必傳。」<sup>5</sup>張維屏洵道咸之世一大詩家。咸豐三年(1853)前後，曾國藩(1811-1872)自京寄詩致意，云：「龍飛初載啟詞場，收括人豪潤建章。今日天涯餘二老，江南梅叟嶺南張。(先生與梅伯言翁皆以道光二年成進士。)」<sup>6</sup>張氏時譽之盛可見一斑。於近代文學史上，張氏至今仍有一席之地，亦可見「道光以來詩家大宗」之稱並非虛譽。<sup>7</sup>

<sup>2</sup> 卜正民、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編，弘俠譯：《鴉片政權》(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頁50。

<sup>3</sup> 轉引自黃剛：〈跨越兩時代，首開新詩風(代前言)〉，《張維屏詩文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2。

<sup>4</sup> 參黃剛：〈張維屏年表〉，《張維屏詩文選》，頁196-208。張氏門人金青茅編有《張南山先生年譜撮略》，清咸豐間刻本，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36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金譜甚簡略，且止於張氏七十歲之年，倒不如黃表有用。

<sup>5</sup> 《清史列傳》，卷73，見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編：《粵詩人彙傳》(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9年)，第3冊，卷9，清4，頁1608。

<sup>6</sup> 本文引用張維屏詩作，主要見張維屏《松心詩集》中《花地集》、《草堂集》二集詩，清道光咸豐間刻《張南山全集》本，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3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為免文繁，徵引後隨文注。此處引見《草堂集》，卷4，頁3a(總頁329)附。另：今人編纂之《嶺南叢書》中有陳憲猷等標點本《張南山全集》(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994年)。此《全集》為簡體字本，應含五冊，但迄今只見三冊。

<sup>7</sup> 此乃施山《望雲詩話·拾遺》中語，見錢仲聯編：《清詩紀事·道光朝卷》，影印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9453引。前人對張氏詩作的評價，可參《清詩

張維屏著述甚富，傳世詩且二千餘，琳琅滿目，而本文所論張詩，集中在其致仕歸鄉後之作。筆者將在晚清世變日亟的時代背景下，探論張氏於兩次鴉片戰爭期間所作之詩。誠如論者所言，張氏詩，辭官以前，率多模山範水、觴詠花月、宴遊唱酬、感懷身世之屬，<sup>8</sup>而其六十歲後的一些作品，則與時代的重大歷史事件息息相關，在內容及技巧上都起了新變。<sup>9</sup>張維屏集詩人、文人、學者、官員、士紳諸身份於一身，在兩次鴉片戰爭期間多有創作，敢於任事，是考察晚清文士/知識分子的思想、情感、生命經驗的極佳個案。<sup>10</sup>

本文在詮釋策略上有一新嘗試。張維屏詩集大致以年月先後編次，本身就呈顯著一部「生命史」，可以循之展開一個以張氏視界為導向的「賦義」進程（process of signification）（這也是原詩集的召喚）。筆者將順著相關文本原來的次序展開閱讀，盡量不作調動，藉著字詞所指點、提示的方向、情景，進入特定的歷史片段（fragments），再循之而尋繹時代更大的歷史場景（包括張維屏看到的和看不到的），以之闡發張維屏的所思所感，同時也展開歷史、文化、文學層面上的詮釋。<sup>11</sup>中國近現代史是各種史觀、主義、政治理念、意識形態、個

---

〔上接頁2〕

紀事》所錄諸家評語，見頁9446-54。關於張維屏於近代文學史中的地位，可參陳永標：〈試論嶺南晚清文學的基本特徵和情感意向〉，《嶺南學》第5輯（2013年12月），頁110-21。張維屏亦曾編刊風行一時之大型詩話《國朝詩人徵略》等，可參程中山：〈略論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談藝錄》之成書、體例及影響〉，《清代廣東詩學考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1-24。

<sup>8</sup> 黃剛：〈跨越兩時代，首開新詩風（代前言）〉，頁18。

<sup>9</sup> 可參張美娟：〈論嶺南詩人張維屏的詩歌創作特徵〉，《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7卷第2期（2012年2月），頁32-35；謝飄雲：〈鴉片戰爭前後開拓詩壇新風的兩位傑出詩人——張維屏與龔自珍詩歌創作比較〉，《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頁37-45。

<sup>10</sup> 關於張維屏思想的基本性格，可參張靜：〈張維屏思想析論〉，《嶺南學》第2輯（2008年12月），頁1-13。

<sup>11</sup> 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第一章「導言：舊秩序」中說：「本卷的研究將要再現生活在歷史事件發生時的人們的觀點、動機以及他們在歷史上對這些事件的理解。……因此必須了解中國人當時的生活狀況，同時還必須了解他們在舊秩序下的自我形象。」《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頁5。這個出發點固然可取，遺憾的是，現代史學研究者幾乎從不以詩歌為論述材料。伊懋可（Mark Elvin）在研究中國環境史的專著中取材於《清詩鐸》，就必須先來一番自辯之辭，其中有一段述及詩歌文本給史學研究帶來的尷尬：「對於史家來說，詩歌是帶有危險的原始資

〔下轉頁4〕

人品味激烈地爭奪話語權的場域，設若我們將種種先入為主的觀念放下，靜心閱讀、觀看，也許在種種「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 以外，會看到些不一樣的風光？

## 二、楔子：張維屏辭官歸里，安居花地

張維屏歸鄉後，卜居廣州花地潘氏東園，其〈花地(有序)〉(道光十八年，1838)云：

海珠之西有鷺潭，鷺潭之南有花地。地以花得名，有花市焉。詩家或作花埭。以地名而言，當從土音曰花地。

花地接花津，四時皆似春。一年三百六，日日賣花人。近海多煙水，離城少市塵。東園數畝地，聊且寄閒身。(《花地集》卷1，頁1a，總頁261)

對一個致仕鄉居、將近花甲之年的老詩家而言，一切似乎都頗美好，如他在〈早春遊花地，飲於東園，即事成詠〉(道光十八年)所歌詠的：

老至當行樂，欣看淑景新。煙霞六旬客，風日萬家春。隨遇心無滯，忘機物自親。不須愁暮色，明月湧冰輪。(《花地集》卷1，頁11a，總頁266)

---

〔上接頁3〕

料，因為大部分詩歌的寫作都是為了抒發情感而非傳遞信息。當它們為政治、法律或組織服務時，唯一直接的目的就是搖旗吶喊，粉飾太平。換句話說，它們能起到宣傳的作用。像帝制晚期的許多中國詩歌一樣，即使它們明言是為某個真實事件而作，也會極盡想像，無中生有。」見伊懋可著，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譯：《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441。這段話道破了西方實證史學家的偏見(也可見出他們對中國詩歌膚淺的認識)，而移之以形容中國一些主流史學家的心態，亦無不可。可是，要是我們所欲瞭解的是如費正清所說的「中國人當時的生活狀況」或「他們在舊秩序下的自我形象」，而不取材於傳統士人的詩集，這簡直匪夷所思。中國傳統士人的詩集含有大量思想情感、日常生活、社會與政治活動的信息，詩作毋寧是構成文士主體性、自我形象不可或缺的部分，研究者若對之置若罔聞，或存而不論，無非是閉目塞聽、自欺欺人罷了。當代史學已發生過「語言轉向」、「敘事轉向」、「文化轉向」的進程，我期待「詩的轉向」(poetic turn)的到臨，至少在中國研究的場域裡。

此詩後次〈春日同陳蘭甫(澧)、金芑堂(錫齡)兩孝廉泛舟花地，飲於東園，席上得句〉(道光十八年)一首，云：

東園我已多時住，新歲來遊主亦賓。對酒喜逢三益友，看花同作一家春。(子姪皆侍。)高歌擊節聲猶壯，小醉拈毫句易真。美景良辰共尋樂，老夫何異少年人。(《花地集》卷1，頁11b-12a，總頁266)

陳澧(1810-1882)，晚清廣東大學者，亦能詩；<sup>12</sup>金錫齡(1811-1896)，亦學者、詩人；二人皆曾任學海堂學長(張維屏亦然)。陳、金年齒相若，而後生於張約三十年，份屬晚輩。<sup>13</sup>三人皆番禺人，為鄉里。張維屏返廣州至逝世前二十餘年間，與廣東數輩文士交遊甚洽，如魚得水，此其晚年生活一大特色，殊堪注意。

道光十九年(1839)秋，張維屏又有大可告慰之事，其〈三兒、四姪、六兒連舉於鄉，詩以示之〉云：

讀書豈為博功名，鄉榜連登亦慰情。三世孝廉孫繼祖，兩科華鄂弟聯兄。(六兒丁酉〔1837〕科，三兒、四姪同己亥〔1839〕科。)雪窗好勵精勤業，雲路還期遠大程。後起莫忘先德蔭，勉思為善紹家聲。(《花地集》卷1，頁16a，總頁268)

桑榆之年，有妻子、兒孫相伴，時而聯袂出遊，在山村水鄉間賞覽勝景，共享天倫、人寰、風雅、詩酒之樂，人生夫復何求？張有〈九月十四日偕內子泛舟花埭，載酒東園，女兒暨諸孫皆侍。越日徧遊大通寺、翠林園、五眼橋、海山館、貝水斗閣、繒步仙祠諸勝，賦詩二首〉(道光二十年，1840)云：

回望雲山紫翠盤，(望白雲山。)離城數里不聞喧。一舟穩載琴書酒，二老同攜兒女孫。瞻眺佛堂又仙觀，徘徊水榭與煙村。清溪且喜無風浪，況有花香送到門。(晚泊東園門外。)(其一)

<sup>12</sup> 《清史稿·陳澧傳》稱其「九歲能文，復問詩學於張維屏，問經學於侯康〔譚敬昭〕。凡天文、地理、樂律、算術、篆隸無不研究」。見《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482〈儒林傳三〉，頁13285。

<sup>13</sup> 陳澧有〈感舊三首〉，詩其二云：「我年未弱冠，初見張南康。(南山先生。)請問讀書法，乞為道其詳。答云四庫書，提要挈宏綱。千門兼萬戶，真如古建章。從此識門徑，漸可升其堂。又言讀書者，古書味最長。當時一古字，語重聲琅琅。我得此二語，如暗室得光。我舉此二語，先生云已忘。賤子不敢忘，書此什襲藏。」見陳澧著，汪兆鏞纂輯，汪宗衍續補：《陳東塾先生詩詞》(香港：崇文書店，1972年)，頁49。可見陳澧不到廿歲即從遊問學於張維屏，對張十分敬重。

勝遊恰好逢秋爽，佳興偏宜傍水涯。景近桑榆須愛日，舟同眷屬似浮家。管絃催出天邊月，錦繡移來市上花。(花埭有花市，家人買花。)但願兒曹知稼穡，(舟行見秋禾已熟。)不妨老子戀煙霞。(其二)(《花地集》卷2，頁8a，總頁273)

詩其二「但願兒曹知稼穡」云云，隱隱然指向其時廣州一帶農業種植的特殊情況，關於這個問題，俟下文「米」的意象復現時再作分說。

張維屏偶爾也會思考宇宙、人類的奧秘，如〈日月〉(道光二十年)所展現的，但他寧可停駐在古老的宇宙觀中：

日月始何代？誰分赤白輪？天公兩眸子，閱盡古今人。金石難同壽，煙雲不礙新。相傳大於地，未敢信為真。(天文家言日輪、月輪皆大於地，未敢盡信。)(《花地集》卷2，頁3b-4a，總頁271)

不過，道光之世，西學東漸，士人風氣大開，種種前此「未敢盡信」之物事，今朝都到眼前來，我們將看到，張維屏的世界觀也會隨而改變。

### 三、張維屏於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期間所作詩考論

詩人六十歲以後本來美好的生活卻給十九世紀中國珠江三角洲充斥著的鴉片和港口的「鬼兵」<sup>14</sup>搞亂了。有必要稍回顧一下鴉片戰爭的歷史概況。

1831年前後，鴉片橫流，從印度各地大量進入廣州；到了1836年，中國每年輸入約1,820噸，總額達1,800萬元。十九世紀頭十年，中國的國際貿易盈餘約有2,600萬元，但1828-1836年間，從中國流出了3,800萬元，導致收支逆轉的正是鴉片。鴉片成為十九世紀最貴重的單項商品，而吸食成癮者與日俱增。1838年，林則徐(1785-1850)稱，中國用「洋藥」者至少佔人口1%。<sup>15</sup>

<sup>14</sup> 如劉禾(Lydia Liu)所指出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番鬼」、「鬼子」等具有指涉(indexical)與象徵(symbolic)功能的、辱罵性的語詞開始在全國傳播，是百姓們「一場話語的遊擊戰，以此抗拒英國戰艦上送來的轟鳴的炮火」。見劉禾著，楊立華等譯：《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頁136、139。

<sup>15</sup> 參《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頁164-71。魏源《海國圖志·籌海篇四·議款》曾舉列道光十七年(1837)中外貿易所涉及的一系列貨品及款項，有助我們瞭解當時的實際情況。要之，是年廣東與英人貿易，英方共購廣東貨品21,816,000員〔下轉頁7〕

中國輸入鴉片，白銀大量流失。在大批量購買鴉片以前，中國輸入的商品中，有90%左右是白銀。白銀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價值儲備、主要納稅手段和重要的流通中介。<sup>16</sup>卜正民指出：「鴉片這種東西能把任何物品變成白銀，要是剝奪了這個最重要的資金來源，英國就無法生存下去了。……這時候的焦點並沒有聚積在吸食鴉片會讓人上癮這個問題上，而是在鴉片進口使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上面。」<sup>17</sup>

清朝在十八世紀曾有禁煙之舉，成效不彰。1820年道光帝登極，決定積極整治。1838年底，湖廣總督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馳赴粵省禁止鴉片貿易。<sup>18</sup>一年多後，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戰爭的第一階段從1840年6月延續至1841年1月。英人制定明確戰略：繞過廣州，北上，佔領舟山島，駛向天津北河口，給清帝遞上照會。<sup>19</sup>

〔上接頁6〕

（銀元），廣東則進口貨物14,478,000員，少於英方700餘萬員。魏源指出：「使無鴉片而以貨易貨，則英夷應歲補中國銀七百餘萬員。乃是歲鴉片價銀反出口二千二百萬員，計銷鴉片四萬箱……。」又，是歲廣東與美國商人貿易，美商共購貨物13,277,000員，廣東則購其貨共3,670,000員，廣東少960萬員。魏源說：「何以不聞補銀？蓋亦鴉片價內開除之數。」列出中國與其他國家貿易涉及的金額後，魏源給出總數：是年外國售予中國貨物共20,148,000員，中國賣出貨物則共35,093,000員，本應有14,945,000員盈利。魏源慨歎：「使無鴉片之毒，則外洋之銀，有入無出，中國銀且日賤，利可勝述哉？」載《海國圖志》，卷2，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1輯第2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頁933-34。本書下文簡稱《資料彙編》。

<sup>16</sup> 中國對白銀的需求情況，可參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著，史建雲譯：《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49-51。

<sup>17</sup> 卜正民、若林正編：《鴉片政權》，頁7。

<sup>18</sup> 《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頁172-77。魏源曾回顧鴉片進入中國的歷程：「初，鴉片烟在康熙初以藥材納稅。乾隆三十年〔1765〕以前，每年不過二百箱。及嘉慶元年〔1796〕，因嗜者日眾，始禁其入口。嘉慶末，每年私鬻至三四千箱，始積澳門，繼移黃埔。道光初嚴禁，復移於零丁洋之躉船。……始躉船尚不過五艘，其烟至多不過四五千箱，可籌火攻，而總督阮元密奏，請暫時羈縻，徐圖驅逐，於是因循日甚。其突增至二十五艘，烟二萬箱者，則在道光六年〔1826〕，兩廣總督李鴻賓設巡船之後。巡船每月受規銀三萬六千兩，放私入口。……道光十七年，總督鄧廷楨復設巡船，而水師副將韓肇慶專以護私漁利，……水師兵人人充橐，而雅〔鴉〕片烟遂至四五萬箱矣。」載《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上）》，見《資料彙編》，頁983。

<sup>19</sup> 《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頁188。

1840年6月，英國戰艦集結在澳門沿海一帶；小部分兵力留後，以封鎖廣州，其餘大軍立即開赴浙江。廣州人天真地認為，英軍被欽差大臣新建的炮臺嚇跑了。8月9日，軍機處獲悉英國戰艦沿海岸線北駛，道光帝懷疑他們要直搗黃龍。8月30日，英軍即要強行通過大沽炮臺，清使節琦善同意在岸上接待英國全權大使，展開談判。9月4日，清帝下詔重治林則徐之罪。<sup>20</sup>

在南方，1841年1月7日，英軍佔領虎門炮臺。道光帝急命鄰省四千萬軍赴援，並派遣奕山率領靖逆軍馳赴廣州應戰。廣州官兵重設防守陣地，布置水路障礙，招募地方兵勇，鼓勵士紳參與抗敵。5月21日，奕山主動出擊，放出燃燒著的木排衝向黃浦江上的英國艦隊。在隨後的戰鬥中，71艘中國戰艦被擊毀，岸上60座炮臺失守。英軍登陸，佔據廣州舊城外北面高地——省城曝露在射程之內，隨時可遭炮轟。5月27日，中英雙方簽訂協議：中方答應，欽差大臣及外省軍隊退出廣州，並於一週內交付600萬「贖金」，以使廣州免遭炮火蹂躪。在英方等待中方履行條款時，發生了廣州人民三元里抗英事件。<sup>21</sup>

### 禁煙忽起中廚火

本節所述張維屏詩，寫於戰爭初起數月。〈江海〉云：

江海妖氛惡，閭閻疾痛深。人情重遷徙，世路歎崎嶇。風鶴三更夢，雲鴻萬里心。多多與桑葚，能否息鴉音？（《花地集》卷3，頁1a，總頁275）

末聯「桑葚」、「鴉音」用典。《詩經·魯頌·泮水》第八章云：「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sup>22</sup>

<sup>20</sup> 《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頁188–89。

<sup>21</sup> 同前注，頁192–95。該年，另一支英國遠征艦隊沿江北上。10月，攻佔舟山，繼而陷寧波，並於此地休整過冬。1842年，清軍發動春季反攻，失敗。接著的中英長江戰役從5月7日持續到8月20日。期間，乍浦失陷，上海棄守。7月20日，鎮江陷落，運河被封鎖，清帝國被切成兩半。8月11日，英軍即要攻擊南京，欽差大臣耆英請求停火。8月29日，中英雙方在英艦康沃利斯號（HMS Cornwallis）上簽訂南京條約。參同書，頁196–204。

<sup>22</sup>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20，頁1404–5。



以鴉(貓頭鷹,「惡聲之鳥」)<sup>23</sup>比擬魯僖公平定之淮夷;鴉得食我桑葚而報以好音,喻淮夷受教化歸服。張維屏轉以鴉、淮夷喻今之「英夷」,呼應詩首之「妖氛」。張氏詩此聯可作兩解。一者,對英人施以懷柔之策,多予寶貨財物,或可息其作惡之心?一者,即便多給財物,彼等乃貪惡之人,會否悔改,實不無可疑。不論是前者或後者,張維屏的想法都有點天真。英人欲多得中國的茶葉、絲綢等貨物固是事實,但此際他們的目的是要傾售鴉片,牟取暴利,中國償付的白銀才是「桑葚」。

〈書憤〉云:

漢有匈奴患,唐懷突厥憂。界雖嚴異域,地實接神州。渺矣鯨波遠,居然兔窟謀。鯁生惟痛憤,灑涕向江流。(《花地集》卷3,頁1a,總頁275)

確實如此,清朝以前,「神州」未曾面對過從遠洋(「鯨波」)而來的敵人。在張氏看來,英人是謀「兔窟」的侵略者無疑,但其實英人沒有侵佔清朝國土的野心,他們只想做生意發財,他們的「兔窟」(殖民地)在印度。

〈孤坐〉云:

斬蛟射虎在人為,大府涵容海是師。礮似雷霆刀似雪,老漁孤坐且哦詩。(《花地集》卷3,頁1a-b,總頁275)

張維屏晚號「珠海老漁」,詩末「老漁」云云,語帶相關。老漁在此盼望,事在人為,局勢不無逆轉的可能。「大府」,明清時期或指代總督、巡撫。「海是師」,固是勉主事者不主故常,開明應變。但進一步聯想,這裡有沒有幾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意味?下句「礮」、「刀」並舉,而從「海」而來的英人的火炮最是厲害。我們知道,林則徐來粵禁煙,從歐洲人那裡買來數百枝槍和一艘用於軍事訓練的外國船,又命佛山鑄造廠鑄製五噸重的大炮。他也命人翻譯西文新聞紙,以觀測敵人動靜。<sup>24</sup>當時不少官員對林大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妄自菲薄,有失國體。似乎,張維屏比他們開明務實。

<sup>23</sup> 鴉,通鴟,鷂鷹,凶暴之鳥。道光帝就曾用鴟比喻英人,說其人「反復鴟張,恐難理喻」。見《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頁192注1引。

<sup>24</sup> 參《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頁185、194。魏源記載:「林則徐自去歲(1839)至粵,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繙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購西洋各國洋礮二百餘位,增排兩岸。……並購舊洋船為式,使兵士演習攻首尾、躍中艙之法。」載《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上)》,見《資料彙編》,頁986。

4月，張氏有〈寒食有感〉云：

閒來諸史自披繙，坐對陳編發浩歎。到眼始驚前轍覆，設身方識古人難。禁煙忽起中廚火，觀水誰生大海瀾？千載談兵祖孫武，不知彼已莫登壇。（《花地集》卷3，頁1b，總頁275）

此詩揭明，這場戰爭是林則徐禁煙所引發的。<sup>25</sup>1840年9月，英艦隊威脅到京畿，清帝下詔重治林罪，故而張氏賦〈寒食〉時，廣州的主帥已是新派的靖逆將軍奕山。張維屏似乎對奕山能否知己知彼、持重應付不無疑慮。

5月以前，張氏有〈湯雨生都督（貽汾）有詩見懷並畫《聽松廬圖》見寄，賦此奉報〉，云：

握手知無日，論心賴有詩。一篇如晤對，千里慰相思。世路驚烽火，生涯寄釣絲。（近號「珠海老漁」。）多情念茅屋，遠贈老松枝。（《花地集》卷3，頁1b，總頁275）

在「世路」的「烽火」還未將人吞噬以前，總得活下去。此時張維屏收到友人從遠處郵來見懷之詩及為己所繪《聽松廬圖》，其感激之情，不難想見。研究古人，關注他們具有歷史意義的思想和行為固然重要，但也不應忽略他們看似尋常、也許無法編織成一個宏大圖景的日常生活的細節，缺乏情感、呼吸，不成其為人。

5月最後三日，發生了三元里抗英事件。張維屏賦〈三元里〉，傳誦一時。詩云：

三元里前聲若雷，千眾萬眾同時來。因義生憤憤生勇，鄉民合力強徒摧。家室田廬須保衛，不待鼓聲群作氣。婦女齊心亦健兒，犁鋤

<sup>25</sup> 當時朝廷大臣及廣州官紳中有「嚴禁」及「弛禁」兩種意見。張維屏起初可能是主張「弛禁」的，林則徐抵粵後，他勸林慎重行事，「毋開邊衅」。參黃國聲：《張維屏》（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67-68。但不久張維屏就參與林的禁煙舉措。張、林是舊識。林抵廣州後，二月初九日出城晤張。十八日，張應邀赴林署所議設局收繳煙槍事。十一月十五日，張維屏、梁廷枏、黃培芳等到林寓所小集，交談時事。參黃剛：〈張維屏年表〉，頁204-5。此外，程美寶指出，林在張及其他士紳的支持下，以大佛寺為基地，和曾任越華、粵秀兩書院監院的梁廷枏一同辦理禁煙事宜。張時任學海堂學長，而在學海堂一眾學長中，亦存在「嚴禁」和「弛禁」兩派不同意見。見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頁176。

在手皆兵器。鄉分遠近旗斑斕，什隊百隊沿谿山。眾夷相視忽變色，黑旗死仗難生還。(夷打死仗則用黑旗，適有執神廟七星旗者，夷驚曰：「打死仗者至矣！」)夷兵所恃惟槍礮，人心合處天心到。晴空驟雨忽傾盆，兇夷無所施其暴。豈特火器無所施，夷足不慣行滑泥。下者田塍苦躑躅，高者岡阜愁顛擠。中有夷酋貌尤醜，象皮作甲裹身厚。一戈已搯長狄喉，十日猶懸郅支首。紛然欲遁無雙翅，殲厥渠魁真易事。不解何由巨網開，枯魚竟得攸然逝！魏絳和戎且解憂，風人慷慨賦同仇。如何全盛金甌日，卻類金縢歲幣謀！（《花地集》卷3，頁2a-b，總頁275）

5月25日，英軍攻陷廣州城北諸炮臺，於地勢最高的永康臺設司令部，大炮可直轟城內。奕山求和，與英人訂立「廣州和約」，答應支付贖城費、外省軍隊撤離等條件。停戰期間，英軍竄擾西北郊村莊，有搶掠、姦淫婦女之事。民眾義憤填膺，奮起抵抗。29日，三元里村民擊退來犯小股英軍。民眾料英軍必來報復，遂在三元古廟結義，相約以廟中三星旗為號，旗進人進，旗退人退，打死無怨。同時，士紳出面號召附近103鄉民眾支援。30日，南海、番禺百餘村團練前來，持戈矛犁鋤圍困永康臺。英軍司令臥烏古(Hugh Gough, 1779-1869)帶兵出擊。民眾且戰且退，誘敵至丘陵地帶。時大雨驟至，英軍火槍受潮不能發射，又有一個連被截至稻田中，數十印度僱傭兵被刀砍斃傷。被圍兩小時後，英軍撤回炮臺。5月31日，民眾再度包圍炮臺，附近州縣團練陸續趕來，總人數增至二萬。他們用土槍、土炮、矛戈、盾牌、鋤頭、鐮鋤與英軍作戰，兒童婦女也吶喊助威，並供應物資。英人不欲與民眾再戰，轉而威脅官府，揚言攻城。奕山聞訊恐慌，派員向團練中士紳施加壓力，士紳潛避，民眾逐漸散去，炮臺解圍。

張維屏的〈三元里〉生動地再現了此次戰役。<sup>26</sup>詩的語言樸素直白，近乎「我手寫我口」，而情緒激昂，發人意氣，敘事則細膩入微，繪聲繪影。在詩末四句，張氏表達了他對此一戰役的感想，頗耐人尋味。觀乎「風人慷慨賦同仇」之句，詩人顯然讚同三元里民眾之義舉。然而，此前一句為「魏絳和戎且解憂」，用魏絳和戎之典。魏絳，春秋時晉國卿，向晉主獻「和戎」之策。晉國對其周圍戎國，前此只有討伐之舉，未聞和戎一說。魏陳和戎「五利」，晉主納其議，

<sup>26</sup> 兩次鴉片戰爭期間，廣東詩人寫下大量關於廣州戰爭、鴉片、三元里、團練的詩詞。可參陳永正：《嶺南詩歌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384-405。

使其和戎。<sup>27</sup>張維屏於此認同和戎，於下句卻謂願與民眾同仇敵愾，驅逐英夷，究竟張氏主戰抑或主和？我覺得，張氏的態度是應和則和，應撫則撫（此意亦見於下述詩中「尚書」、「左傳」一聯），但應戰便戰，主事者斷不能讓夷狄「金繒歲幣謀」，一味向列強輸款求和。

### 避居遠村

是役之後，張維屏曾避居遠村，期間有數詩頗可細味。〈避囂〉云：

非關肥遯愛煙蘿，自避囂塵戀軸藹。翰墨緣疎三益少，金銀氣盛二豪多。《尚書》振旅原無戰，《左傳》平戎本用和。防守近行精衛策，未能填海且填河。（聞有獻策用石填河，以禦外寇。）（《花地集》卷3，頁2b，總頁275）

說避地遠村「非關肥遯」，是「避囂塵」、「愛煙蘿」、「戀軸藹」，故作姿態而已。「三益」，良友也，村居時「三益少」，翰墨唱酬之事無多。從詩下半可知，張氏心繫的還是剛發生的中英戰爭。觀乎《尚書》「無戰」、《左傳》「用和」之語，可知張氏以奕山輕啟戰事為不智。<sup>28</sup>

〈酬陳笠漁廣文（作舟）〉云：

離亂君為客，萍蓬少定居。軍聲驚唳鶴，鄉夢冷鰥魚。（君方悼亡。）  
賴有吟篇富，能將鬱抱舒。扶衰無別物，我亦藉詩書。（《花地集》卷3，頁3a，總頁276）

〈村居〉云：

山青水碧晚霞紅，邱壑之間置此翁。三百篇詩常在手，五千年事每羅胸。頗能活潑知魚樂，自笑生涯與蠹同。畢竟村居藏拙好，妄談經濟有何功？（《花地集》卷3，頁3a，總頁276）

<sup>27</sup> 事詳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襄公四年》（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29，頁231（總頁1933）。

<sup>28</sup> 詩中「填河」云云，或即諷奕山。魏源有記云：「六月，詔責奕山：視師廣東半載，毫無方略，屢命收復虎門，攻香港，以牽制閩浙賊勢，皆以造船未就為詞，惟以填塞河道為事。革去御前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載《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下）》，見《資料彙編》，頁1000。

村居靜好，「經世濟民」之念稍歇，張維屏重拾了閒居養志、詩書自娛的心情，且頗能享受鄉村的野趣生機。

上述三詩，以詩藝言，不過爾爾，老詩人信口吟哦而已。但讀來尋常，卻有若干消息不容錯過。一者，此處顯露一個傳統仕紳、文士應變的「機制」，即俗諺所謂「小亂避城，大亂避鄉」，時局不靖時，逃離城市，甚或避隱於深鄉僻壤。<sup>29</sup>能逃，有條件逃，又有逃的去處，人就不至於太絕望。然而，離家後如何自處？倘無思想資源、精神修養，終日惶惶不安，苦悶抑鬱，日子也不好過。村居期間，張維屏依然心懷國事，意緒不至於太頹唐，此可以想知。更重要的是，他有詩、書、史的滋潤，可以自適其適。這種傳統「人文」的涵養在樸素自然的環境中不難找到契合之處，勃發生機。張維屏這個應變、處變的模式我們在下文還會看到。

### 越臺懷古、思考鴉片

局勢穩定後，老詩人高高興興回到家裡，其〈自適〉云：

江海銷氛祲，琴書理敝廬。夢因微醉穩，懷借朗吟舒。杜老洗兵馬，韓公驅鱷魚。鰕生聊自適，短句賦閒居。（《花地集》卷3，頁3a，總頁276）

回到省城後，張維屏卻也觸目傷心，因有〈越臺四首〉之詠：

往者蠻夷長，依然中國人。背秦聊號帝，朝漢自稱臣。詎意重洋水，能生內地塵。越臺烽火息，回首一酸辛。（其一）  
茗薜千甌水，芙蓉萬管煙。利都緣口腹，害遂徹中邊。烹淪泉兼品，吹噓火自煎。兩般閒草木，生殺竟操權。（其二）  
《禹貢》金三品，鏐銀始著名。由來數千載，此物未通行。（銀通行自明始。）蚨散能消患，狼貪欲取盈。（銀數至千萬，史書所未見。）儻留為重賞，或可練精兵。（其三）  
碧海鏡磨銅，雲霞煥太空。全消氛祲黑，共仰日華紅。北極星常拱，南琛貨自通。綢繆防後患，經濟望群公。（其四）（《花地集》卷3，頁3a，總頁276）

<sup>29</sup> 「小亂避城，大亂避鄉」此一諺語出現於明清改朝換代之際。關於其時士人的逃難情況，可參巫仁恕：〈逃離城市：明清之際江南城居士人的逃難經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3期（2014年3月），頁1-46。

張氏此四詩，道及「重洋水」、「內地塵」，喻今英人對中國之挑釁；「茗蕻」、「芙蓉」，借指茶葉與鴉片；「鏐」、「蚨」，金銀之謂；「北極」、「南琛」，喻帝主與南方所產珍寶。此四大端，都是中英鴉片貿易與衝突要緊的關節。詩人在越臺懷古，嗟歎世運丕變，國事蝸蟻。詩人從越臺放眼海洋，一時百感交集。以歷史後見之明觀之，張詩中的這些語詞其實可以把我們引領到一個張氏於其時未必瞭解的、複雜的國際貿易局面。

鴉片出現以前，中國向外國購買的主要是原棉、白銀以及毛織品，而輸出的是昂貴的茶葉、絲綢、瓷器、漆器（英人對茶葉尤其渴求）。1813年前後，西方主要在賣印度原棉、倫敦的打簧貨、中東的沒藥、馬德拉斯的檀香木、馬來西亞的玳瑁等。<sup>30</sup>壟斷與中國貿易的東印度公司買賣茶葉賺到的錢卻很有限，儘管到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英國政府從茶葉稅中獲得歲入的10%，東印度公司的收益卻並不可觀：1780–1790年間，對印、中兩國貿易的利潤僅有200萬英鎊左右，只折合原來股本額的5%。<sup>31</sup>讓東印度公司開始大賺的是鴉片。1830年，東印度公司有約400萬鎊從印度運回英國。這筆盈餘，大部分先要變成鴉片在廣州賣掉，然後再購買茶葉運回國內。經過好幾個世紀的貿易之後，西人終於發現中國人會大量購買的東西。<sup>32</sup>卜正民不無幽默地說：「沒有鴉片，英國就無法把它對中國貿易的巨大赤字變成盈餘，除非它要求國人不再喝茶……。」<sup>33</sup>以前是白銀流入廣州，現在因為償付鴉片進口，白銀大量流出。收支失衡迅速破壞中國的稅收和商業。農民是以銅錢或穀物交納賦稅的，但官吏上解時用的是銀兩，所以實際稅率取決於折算率的差異。白銀稀少，就貴，實際稅率大增（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就爆發了大規模的抗稅運動）。<sup>34</sup>

<sup>30</sup> 《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頁163。彭慕蘭幽默地說：「搜尋檀香和其他在中國受到珍視的異國風味的輸入品對眾多太平洋島嶼造成了極大的生態損害，極具諷刺意義的是，只是當開往中國的船隻開始裝滿鴉片時，它們才得到解放。」見《大分流》，頁148。

<sup>31</sup> 《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頁158–59。

<sup>32</sup> 同前注，頁165。

<sup>33</sup> 卜正民、若林正編：《鴉片政權》，頁7。

<sup>34</sup> 《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頁122–23。關於抗稅運動，可參王國斌（R. Bin Wong）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174–97。

〈越臺四首〉其二「茗薺千甌水，芙蓉萬管煙」云云，道出其時英人與國人分別對茶葉和鴉片有莫大的嗜好耽溺，更因此引發這場戰爭。然而，張氏慨歎「兩般閒草木，生殺竟操權」，則不免小看了這兩種草木。這兩般草木並不平凡。首先，嗜好之於人，其害足以焚身剝膚，不是其人，難以想像其控制力量（尤其是鴉片這種毒品）。<sup>35</sup>此外，張詩其三云：「蚘散能消患，狼貪欲取盈。（銀數至千萬，史書所未見。）」張氏看到英人的索求無度，但大概不甚明白，鴉片乃扭轉中英貿易收支失衡的關鍵所在，而茶葉非僅英國民眾的口腹嗜好，通過課稅，它更是英國政府可觀的歲收。再者，白銀固然關係到某宗買賣的金錢數額，但它也是其時國際貿易、折算的通貨，資本以之流轉，背後存在一個龐大的國際貿易關係網絡，並非只是英人對中國的單邊索求。那裡有國際貿易，那裡就有白銀流通，世界已回不去以物易物的原始模式了（張氏「儻留為重賞，或可練精兵」云云，未免一廂情願）。從上述種種看來，張氏此四詩，在抒情層面上不無動人之處，但對中英鴉片戰爭的本質以及其背後更龐大的貿易實況、機制、商業文化似乎沒有足夠的洞悉能力。

#### 火炮、團練、海門

1841年，張維屏還有一首頗富情調的詩，其〈飲酒五首〉其四云：

世間兩大端，唐後乃有之。其一曰木板，雕刻傳文辭。其一曰火器，當者軀立糜。古苟有剗，載籍皆留遺。古苟有火礮，智勇皆難支。我醉發異想，欲乞皇天慈。願多生梨棗，著述易久垂。願勿產硝磺，火技無所施。（《花地集》卷3，頁4b，總頁276）

廣州人知道火器、火炮、硝磺、火技的厲害，英國海軍在不久前的戰爭中擊毀了76艘中國戰艦，還幾乎就要炮轟廣州城了。在這首詩中，張氏表達了對武器的厭惡。但願望歸願望，事實歸事實，廣州地區（以及中國其他省份）為了防禦外國人以及越來越多的盜匪，迅速軍事化起來，而張維屏作為致仕官員以及地方大紳士，在這事上應有一定程度的參與。鴉片戰爭後的幾年間，張維屏有

<sup>35</sup> 其實，張維屏在《國朝詩人徵略·初編》也說過：「〔鴉片〕能使人食而嗜之，既嗜之，雖欲不食而有所不能，且一日不食而其人已如疾病在身，而形神為之不安，較之饑渴而有甚，是物之害人如此！」見黃剛：〈跨越兩時代，首開新詩風（代前言）〉，頁4-5引。

多首春遊詩。我們看到，戰爭的陰影揮之不去，廣州人迅速操練起火炮來，如〈正月初六日，周秀甫太守（懷棠）招同梁香浦孝廉（信芳）、陳棠溪祠部（其錕）、黃蓉石比部（玉階）泛舟小港，看桃花，訪是岸寺。步行數里至漱珠岡，望見道士，乃知是誤。歸至是岸，飲于舟中，即事有作〉有句云：「本期登佛堂，乃誤造仙宅。人疲境自佳，足倦意轉適。遙聞演礮聲，練兵備盜賊。吾曹多燕居，未免近安逸。此行使習勞，此意須省識。」（《花地集》卷3，頁5a，總頁277）又，〈春日花地遇故人〉云：

香國船常聚，芳辰客不閒。花開征戰後，人老別離間。水小能通海，臺高可當山。（貝水新建斗臺。）哀慵難學圃，聊且閉柴關。（《花地集》卷3，頁5b，總頁277）

〈江干〉云：

江干柳又絲，散步偶尋詩。雨過一蓑重，湖平雙槳遲。鼓聲人拜社，兵法客談碁。忽憶去年事，戰船方樹旗。（《花地集》卷3，頁5b，總頁277）

〈三月初九日，陳蘭甫孝廉（澧）招同梁章冉廣文（廷枏）、譚玉生明經（瑩）、許青皋茂才（玉彬）、金芑堂孝廉（錫齡）、李硯卿茂才（應田）集學海堂看木棉〉云：

綠野散輕陰，朱霞明茂林。攀枝纔照眼，烽火尚驚心。（木棉名攀枝花，又名烽火樹。）西漢幟如在，（山堂上即越臺。）東風春又深。吾曹復良會，把酒合高吟。（《花地集》卷3，頁6a-b，總頁277）<sup>36</sup>

〈珠海〉云：

珠海忽然窄，陽春煙景開。晴天蜃樓見，澤國水嬉來。故事徵唐宋，豐年擲貨財。（燈船及童男女扮故事約數十船。）最難兵燹後，依舊詠康哉。（《花地集》卷3，頁6b，總頁277）

<sup>36</sup> 陳澧集中有〈木棉花盛開，邀南山先生、章冉、玉生、青皋、芑堂、研卿諸君集學海堂（癸亥）〉一詩。陳、張二詩提及之時、地、人、事相符，固是同一雅集之作。陳氏詩題下小注「癸亥」當為「癸卯」之訛。癸卯為道光二十三年（1843），設若陳氏所紀不誤，則張詩亦當作於是年。陳詩見《陳東塾先生詩詞》，頁79。本文張詩繫年，除張氏有自紀年月者，均係筆者就相關作品及其前後詩所透露之消息推尋而得，但因諸集乃選本，首尾不全、條理不清的情況時或有之，未必有足夠信息可據以確定相關作品之作期，幸讀者諒之。



鴉片戰爭喚醒了人們的憂患意識，紛紛籌辦地方團練，演習操練。上引數詩中，有「遙聞演礮聲，練兵備盜賊」、「鼓聲人拜社，兵法客談碁」之句，說的就是團練之事。團練在廣東地區或稱「社」，在其他地區一般叫「團」。<sup>37</sup>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及五十年代初期，華南、華中湧現的團練，又與地方盜匪為患、農民騷亂、官吏貪腐無能息息相關。張氏「練兵備盜賊」云云，也就是這些情況的反映。

團練是地方上「一種低水平的軍事化過程」。<sup>38</sup>緣何出現？這得從清朝的正規軍說起。從龍入關後，清軍普遍不滿員，訓練馬虎。有事，軍隊從滿、漢、蒙各旗抽調而來；無事則負責駐防，多半無所事事。綠營漢軍也無十足兵力。花名冊弄虛作假，要點卯，就僱些苦力充數；操練重在觀瞻，不講究實際；打起仗來，不是開小差就是劫掠農村。對英戰爭期間，為了彌補這些缺陷，林則徐曾嘗試招募鄉勇。為了節約軍費，道光帝在1840年把鄉勇的舉措擴大到其他沿海省份，但問題叢生，因為招來的鄉勇以前是匪徒、鹽販或強盜，很不老實。<sup>39</sup>自己家鄉自己救。三元里事件發生後，紳士和民眾獲得啟發，攜手組織團練。在廣州北面，誕生了一個總局，以協調各市鎮的團練，命名「昇平社學」，官方認可。<sup>40</sup>史學家指出：「它不是狂熱的三元里式的愛國主義，而是支配著官辦地方武裝形式的國家民兵的那種帶有官僚氣的形式。」<sup>41</sup>

張維屏對戰爭的憂慮並不停駐在家鄉一隅，他有更大的關懷和思考。1842年，鴉片戰爭的戰場轉移到江南，之後威逼京門，朝野大駭。張維屏對當時的局勢時有所聞，憤慨不已，其〈客至〉云：

<sup>37</sup> 參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謝亮生、楊品泉、謝思焯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修訂版)，頁105。

<sup>38</sup> 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頁59。

<sup>39</sup> 《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頁185。

<sup>40</sup> 同前注，頁225–26。又，關於昇平社學的性質、組織、運作，詳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頁69–76。

<sup>41</sup> 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頁63。關於團練制度，孔飛力有這樣的觀察：團練是兩種歷史潮流的匯合：一種是邊界地區官員們的行政傳統，另一種是地方名流的自發武裝。在白蓮教叛亂之後，團練多指紳士自己的鄉村防禦組織。到了嘉慶末年，團練已成為清代國家機器邊緣的、但可以明確辨認的部分。十九世紀中葉，團練仍然表現出它特有的兩重性：它處於政府法規的限制之下，但又受地方實踐多變的、無法規可循的需要的制約。見同書，頁64。

客訪老漁煙水中，晚涼相送過橋東。大星不肯讓明月，小艇豈能當逆風？舊學久荒今始覺，新聞奇憤古無同。野鷹且莫誇頭角，會見神鵬下碧空。（《花地集》卷3，頁6b，總頁277）

審度全國形勢，張維屏知道保衛廣東海門以及其他與海洋接壤的地區至關重要，其〈海門〉云：

七省邊隅接海疆，海門鎖鑰費周防。賈生一掬憂時淚，豈獨關心在梓桑。（《花地集》卷3，頁7a，總頁278）<sup>42</sup>

大約在1842年8月上海失守後不久，張維屏寫下一首可譽為「詩史」的名篇，是為〈三將軍歌（並序）〉：

三將軍者，陳公聯升、陳公化成、葛公雲飛也。道光庚子〔1840〕、辛丑〔1841〕、壬寅〔1842〕，三公皆以禦夷寇，力戰歿于陣。余聞人述三公事，作〈三將軍歌〉。

三將軍，一姓葛，兩姓陳，捐軀報國皆忠臣。英夷犯粵寇氛惡，將軍奉檄守沙角。奮前擊賊賊稍卻，公奮無如兵力弱。兇徒蠡擁向公撲，短兵相接亂刀落。亂刀斫公肢體分，公體雖分神則完。公子救父死陣前，父子兩世忠孝全。陳將軍，有賢子；葛將軍，有賢母。子隨父死不顧身，母聞子死數點首。夷犯定海公守城，手轟巨礮燒夷兵。夷兵入城公步戰，槍洞公胸刀劈面。一目劈去鬪愈健，面血淋漓賊驚歎。夜深雨止殘月明，見公一目猶怒瞪。尸如鐵立僵不倒，負公尸歸有徐保。陳將軍，福建人，自少追隨李忠毅（長庚），身經百戰忘辛勤。英夷犯上海，公守西礮臺。以礮擊夷兵，夷兵多傷摧。公方血戰至日昏，東礮臺兵忽奔散。公勢既孤賊愈悍，公口噴血身殉難。十日得尸色不變，千秋祠廟吳人建。我聞人言為此詩，言非一人同一辭。死夷事者不止此，闕所不知詩亦史。承平武備皆具文，勇怯真偽臨陣分。天生忠勇超人群，將才孰謂今無人？嗚呼，將才孰謂今無人？君不見二陳一葛三將軍！（《花地集》卷3，頁7b-8a，總頁278）

<sup>42</sup> 口岸之中，虎門位於中央，尤闊大，跨越珠江河道，扼守通往廣州的水道，葡萄牙人稱之為 Bocca Tigris。見馬立博（Roberts Marks）著，王玉茹、關永強譯：《虎、米、絲、泥：帝制晚期華南的環境與經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60。

張氏歌頌的三將軍，守衛舟山的陳將軍與防護上海的葛將軍都曾用火炮與「夷寇」作殊死之戰。儘管張維屏希望戕害人命的槍炮從人間消失，但現在要是沒有它，恐怕連國家的命都保不住了。張詩對二位將軍用火炮轟殺「夷兵」的刻劃尤為著力。<sup>43</sup>

回到地方層面，官方對團練的要求是「官督紳辦」，責令紳士總其事（朝廷也是為了省錢，因為團練經費自理）。<sup>44</sup>以張維屏的身份地位而言，在廣州省城無疑是一位大紳士。從下述二詩看來，他是支持辦練團的，也應該出過不少力。1843年夏天，張氏有〈金醴香員外新居有小園，園有水石竹木之勝，自顏其亭曰「小蘭亭」，蓋先世本會稽也。夏日邀同人讌集，為賦二詩〉，詩其二云：

仙曹合赴紫宸班，重話艱辛鬢欲斑。黃木灣前防戰壘，（獵德堵防。）  
青山缺處護嚴關。（燕塘團練。）當時敢信危巢在，此日真容倦羽  
閒。料理新園邀舊雨，一樽相對且開顏。（《花地集》卷3，頁11b，  
總頁280）

詩中「黃木」、「青山」一聯，反映的就是地方上普遍軍事化、積極練團的情況。<sup>45</sup>從頸聯看來，團練組織起來後，老百姓與「小蘭亭」雅士們都安心不少。

<sup>43</sup> 事實上，張維屏對當時國人的火炮技術水平相當關心，曾為在粵主持炮局多年之鑄炮能手丁拱辰（星南，1800–1875）所著書撰序，是為〈演礮圖說增補則克錄合序〉，見張維屏：《松心文鈔》，清道光咸豐間刻《張南山全集》本，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33冊，卷4，頁42a–43b（總頁467–68）。

<sup>44</sup> 參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頁62。就如程美寶所指出的，在道光年間的廣州，把官員、商人、學者一併扯入政治角力的無疑是鴉片問題，而學海堂學長與地方政治的關係從未間斷過。廣東各地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紛紛組織團練，同期間被委任為學海堂學長的陳璞（1820–1887）和李光廷（1812–1880）就是出資籌辦團練的地方領袖。學海堂最著名的學長陳澧也曾為「大憲」所請，出辦團練籌防。見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頁174–80。

<sup>45</sup> 東南獵得、西南大黃滯、城東燕塘等均係廣州城之防衛重地，魏源《海國圖志·籌海篇二·議守下》有云：「惟廣州及江寧，夷船可直抵城下。粵東新城以外，市廛櫛比，既無可築外郭之地，惟獵得、大黃滯二處礮臺，實省城內障，與虎門外障並重。於此二處扼險，果能阻遏夷艘，則堂奧高枕。」載《海國圖志》，卷2，見《資料彙編》，頁924。

數年之後，時屆1849年，張氏有〈三月初六日，馮西潭明府（沅）、壽菊泉明府（祺）、羅蒲洲廣文（家政）、金醴香員外（青茅）、許賓衢觀察（祥光）、梁章冉廣文（廷枏）、張清湖廣文（應秋）、譚玉生廣文（瑩）、仇健亭廣文（乾厚）、丁桂裳廣文（熙）同過敝廬閱清水濠壯丁八百餘人，閱畢雨至，即事有述〉云：

賢侯治事不違安，朋舊關心勸練團。守望義原遵《孟子》，閭胥法亦本《周官》。防虞自合修矛戟，敵愾還期共膽肝。好雨應時欣有兆，洗兵從此慶安瀾。（《草堂集》卷2，頁5b，總頁306）

詩題頗長，特意記錄時地人事，讀者可藉知「過敝廬閱清水濠壯丁」<sup>46</sup>的一眾人等中，有「明府」（縣令）、「廣文」（教授）、「觀察」（道員）、「員外」（閒職郎官、社會賢達）等頭面人物。清水濠的團練有八百餘壯丁，聲勢頗張。此次聚首，無疑是地方官吏和一眾紳士共同出席的一次「閱兵」活動，而張維屏置身其中，復賦詩歌頌其事，可以見出他積極參與團練事務（亦有謂清水濠團練就是他和另一鄉紳何玉成操辦起來的）。<sup>47</sup>

#### 四、張維屏於廣州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57）期間詩作考論

老詩人大概意想不到，有生之年，還會經歷又一次鴉片戰爭。咸豐五年（1856），戰事爆發，此時上距第一次鴉片戰爭已十六年，張維屏臻七七喜壽之歲。這一回，廣州蒙受極大災難，對珠海老漁的影響也更大。

先略述此次戰爭背景。太平天國叛亂期間（1851–1864），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1858–1860年間，英法聯軍有遠征中國之役。此前，英人嘗試與南京太平軍商談貿易，不果。到了1854年，西方列強已認清，此時此局無利可圖。英國決定中立，不干涉中國此一內戰。英、法、美改變策略，試圖通過修改條約以增加利益。三國公使紛紛在福州、上海、天津提出申訴或建議，企圖說服時任兩廣總督的葉名琛（1807–1859）。<sup>48</sup>

<sup>46</sup> 張維屏出生於新城清水濠，亦歸老於斯。《羊城古鈔》載：「清水濠，即古東濠也。在南城宋行春門下，穴城而達諸海，長二百有四丈，廣十丈。」見黃佛頤編纂，仇江、鄭力民、遲以武點注：《廣州城坊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459。

<sup>47</sup> 士紳何玉成（生卒年不詳）在三元里抗英事件及組織團練防禦英人入侵等活動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參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修訂版），「何玉成事略」條，頁204–5。

<sup>48</sup> 此處及下所述之基本史實，多據《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頁236–41。

1856年10月，發生所謂亞羅號事件(The Arrow Incident)。亞羅號曾在香港登記，掛英國旗，而葉名琛的水師在船上逮捕了涉嫌走私鴉片的水手，並撕下英國旗。英國領事要求葉釋放水手並公開道歉。葉釋放了水手，但堅拒道歉。後果是英國海軍再度攻佔虎門炮臺，一直打到十三行。每隔十分鐘，葉名琛的衙門便遭炮轟一次；轟垮城牆後，突擊隊衝入衙門揚威耀武。葉拒絕談判，並下令關閉海關，對外貿易停頓。12月，十三行被焚毀。1857年春，英國遠征艦隊航向中國。6月，印度兵變，遠征部隊先赴印度加入鎮壓，進攻廣州推遲到12月。同時，法國也因中國處死一名神甫而與英方合兵。英法聯軍約5,700人，兵臨廣州城下。12月28日，聯軍炮擊廣州城。1858年1月4日，聯軍派遣小隊活捉兩廣總督及廣東巡撫。(葉總督被英人押運至印度，次年客死異鄉。)<sup>49</sup>廣東巡撫被佈置為傀儡行政長官，與聯軍以「聯合委員會」的名義共同統治廣州將近四年。1858年2月，委員會重啟停頓了一年多的港口貿易，並派出中國警察與英法海軍陸戰隊共同組成的巡邏隊，沿街維持秩序。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歷史背景下，我們繼續探論張維屏的詩作。

### 「英夷」炮轟廣州城

1856年末，張維屏有〈戰場〉詩云：

纔銷兵氣喜平康，忽報珠江起戰場。曾見海鯨來跋浪，(辛丑〔1841〕夷事。)又驚風鶴逼蕭牆。火原猛烈兼秋令，(城內外延燒屋店數百間。)寇最猖狂此夜郎。聞道俄羅方困汝，(英夷近為俄羅斯所困。)有能何不早還鄉？(《草堂集》卷5，頁14a-b，總頁352)

詩中說的「兵氣」，指不久前的紅巾之亂。太平天國動亂期間，廣東也不安寧。華南不靖，福建的茶葉以及安徽、江蘇的絲綢改經海路運至上海。原來翻越梅嶺而至廣州的舊運輸路線受阻，船民和碼頭搬運工失業，鋌而走險，紛紛加入秘密會社。1854年，廣州天地會發動紅巾之亂。翌年，事敗，數萬人被處決。禍不單行，紅巾亂後不久，「又驚風鶴逼蕭牆」，1856年，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

<sup>49</sup> 佔領廣州後，英女王特使及在華全權代表額爾金伯爵·布魯斯(James Bruce, 1730–1790)揮軍北上。據說，他俘虜葉名琛並把他押送印度之事，「在清朝官員中間產生的影響甚至比佔領廣州還要大」。見何偉亞(James L. Hevia)著，劉天路、鄧紅風譯：《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頁39。

爆發。頸聯所寫，即英軍炮轟廣州城，「城內外延燒屋店數百間」的情景。末聯夾注提及「英夷近為俄羅斯所困」。張氏聽聞的，應是1853–1856年間的克里米亞戰爭(The Crimean War)；俄國與英、法為爭奪小亞細亞地區的利益而開戰。張氏幸災樂禍，但消息似乎不是那麼靈通，蓋此戰最終以俄方戰敗求和，於1856年3月簽訂巴黎和約作結。

1841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張維屏應是在戰事稍歇時才避居遠村的。這次戰亂，張及家人急忙逃出，躲到附近寺廟。是夜，張氏有〈方外〉一詩云：

空聞礮火日憑陵，(礮子入城以千計，傷斃僅廿七人，眾謂有神助。)火自炎炎心自冰。居近瞿曇人伴佛，梵能超度鬼求僧。(借寓東郊禪寺，內多停柩。)延年妙藥無過酒，入夜良朋祇有燈。欲養閒身借方外，一瓶一鉢一枝藤。(《草堂集》卷5，頁14b，總頁352)

此詩大妙。詩人本年七十七歲，局勢嚴峻，他卻心情淡定，「火自炎炎心自冰」。詩多寫身邊物事，出以「閒筆」，著眼於細微處。張氏所借居禪院內多棺柩，思之恐怖，老人卻以之為詩料，幽默道來。詩下半尤佳，似閒居寺院道觀，枯寂，卻不無樂趣，若無詩上半，迥不似逃難時經歷。頷聯上句道及酒，此詩或為飲酒壯膽後吟得，亦未可知。

#### 避難泌沖，閒居閱圖，繪《四海團扇》

上文述及，舊日仕紳、文士有一「小亂避城，大亂避鄉」的逃難機制，張維屏於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曾一度避居遠村，即為一例。此時大亂復作，張氏再次「出城入鄉」，其〈出城有作，寄諸同好〉云：

如雷火礮劇縱橫，老幼提攜且出城。(出城入鄉。)窮乏況加遷徙累，亂離深見友朋情。歷觀載籍無成案，(書史所載，未有礮子重數十斤，而遠及數里之外者。)若問安危仰太清。(礮子多，傷人少，自是天佑。)前路茫茫聽天命，相期松柏保堅貞。(《草堂集》卷5，頁15a，總頁353)

上述三詩(及下一詩)，都有英軍炮轟廣州城、民居大片焚毀、人命傷亡的形容。炮火猛烈，人民大驚恐，不難想見。此處則有夾注謂「書史所載，未有礮子重數十斤，而遠及數里之外者」，張維屏乃感歎於英人武器火炮之精良，炮彈射程遠，威力大。詩末聯「前路茫茫聽天命，相期松柏保堅貞」流露的意緒，亦不如〈方外〉一詩之鎮定自若。

張維屏逃往泌沖。<sup>50</sup> 泌沖村，在今佛山市南海區大瀝鎮，始建於南宋年間，因趙姓、鄒姓、陳姓先後在鰲峰岡麓聚居而形成。張氏〈泌沖(離城三十里)〉云：

避亂到江村，村深水到門。笑言雜童稚，出入見雞豚。宋代宗風遠，鄒人古誼敦。(鄒姓聚族而居，言自宋始遷於此。)但能安作息，隨處是桃源。(《草堂集》卷5，頁15a，總頁353)

得以逃離戰場，看泌沖一切都彷彿乎桃花源，且此地並非荒村野店，鄒氏聚族而居，有歷史，有文化(詳下文)，對亂離之人來說，是相當理想的棲遲之地了。不久，新年(咸豐七年，1857)到臨，張氏賦〈昇平〉一首，云：

桃符新換頌昇平，且喜連朝熄礮聲。太息市廛成瓦礫，(舊臘城外屋店，燒燬千餘間。)欲憑江水洗刀兵。外洋自宋纔通粵，夷舶何人許近城？(國初夷舶未入省河。)二百年來談異事，海珠臺榭忽全傾。(賊據海珠，打礮入城，官軍收復，拆為平地。)(《草堂集》卷5，頁15b，總頁353)

此詩只有首聯勉強應題，且「頌昇平」云云，實在言之過早(本年底，英法聯軍將再重創廣州)。下三聯及夾注詠及去歲之杪廣州城遭炮轟之慘狀及邇來城中滿目瘡痍的情況，可見詩人心之所繫及無奈之情。「夷舶」近城、「夷人」入城一直是引起中英(以及他國，如法、美)爭執的事端。前次鴉片戰爭以中英雙方於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作結，條款包括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港為通商口岸，但外國人在商埠長期居住的要求並未得到允許。<sup>51</sup> 在廣州，外國人被限制居住在十三行濱江地段約四英畝之地內。英國人堅持入城，廣州人頑強抵抗，衝突不斷，有謂「廣州人的高傲和敵意常常不亞於英國人的魯莽和傲慢」。<sup>52</sup> 一直要到1858年，英國人才能進入廣州城，而且是強打進去的。<sup>53</sup> 在「夷人」近城、入城這事上，張維屏無疑是屬於排外派的。

<sup>50</sup> 麥哲維(Steven B. Miles)在研究廣州學海堂與晚清嶺南學術的專著中述及紅巾之亂及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廣州城文士及學海堂學長避居鄉間的情況，可參。見 Steven B.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 171–75。可惜該書並未述及張維屏的個案。

<sup>51</sup> 《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頁204。

<sup>52</sup> 同前注，頁226。

<sup>53</sup> 同前注，頁240。

話說回來，張維屏在泌沖避難的日子似乎過得頗愜意。我們記得，上次避居遠村時，張氏曾抱怨「翰墨緣疎三益少」，無多風雅唱酬之事也，而這回，他在泌沖鄒姓族人中找到「高人」，相與談天說地，意興甚濃，其〈鄒特夫茂才有詩見贈，賦此奉酬，並題其所著《周天圖說》二首〉云：

烽火催吾老，鄉村假館新。此來原避寇，喜得近高人。稽古功探奧，談天論入神。中年曾願學，耄矣愧因循。（其一）  
自古疇人術，前明漸失傳。皇朝生聖哲，理象闡人天。（《欽定數理精蘊》、《御定曆象考成》。）梅（文鼎）薛（鳳祚）並精究，利（瑪竇）南（懷仁）多近偏。君能通妙義，（君精天文、曆算之學。）允矣繼諸賢。（其二）（《草堂集》卷5，頁15b-16a，總頁353）

鄒特夫即鄒伯奇（1819-1869），不赴科舉，終生秀才，但學術成就甚豐，有近代廣東第一位科學家之譽。張維屏在詩中稱讚鄒氏之「疇人術」（即天文曆算之學）高超絕倫，實則鄒氏還精通幾何光學、測量學，也是中國攝影術之先驅，成功拍攝過人物肖像。鄒氏又製作過不少科學儀器，如望遠鏡、顯微鏡、天球儀、稱為「七政儀」的太陽系模型等。<sup>54</sup>學者所治之學與專長容或不同，但有胸襟懷抱者都能惺惺相惜，況且張維屏「此來原避寇」，而「喜得近高人」，其欣悅自不待言。<sup>55</sup>鄒特夫確是高人，本年，三十九歲的他被推薦出任廣州學海堂學長，教授算學。

張維屏居泌沖期間所讀之書，不獨鄒特夫所撰《周天圖說》一種。張氏〈隨緣〉云：

泌水洋洋可溯洄，（地名泌沖。）枕流高臥亦悠哉。屋前遠樹千株列，門外方塘一鑑開。清景卻從無意得，亂離翻似卜居來。世間百

<sup>54</sup> 可參戰鬥勇：〈略論鄒伯奇在中國近代科技史上的地位〉，《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5期（2011年9月），頁82-87；陳志國、倪根金：〈鄒伯奇與學海堂述論〉，《廣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頁135-42；安海波：〈晚清「光與成像」：嶺南鄒伯奇的攝影理論與實踐〉，《裝飾》第286期（2017年2月），頁142-43。或謂鄒伯奇製作了中國第一部「相機」，但此點有爭議，鄒伯奇的攝影器可能不是照相機，而是歐洲畫家常用的暗箱（camera obscura）。

<sup>55</sup> 鄒伯奇〈南山先生寓居村中枉駕見過並示大集率成二律奉報〉詩其二有「相識昔傾蓋，相逢今比鄰」之句，可知二人為舊識。鄒詩見張《草堂集》，卷5，頁16b（總頁353）附錄。其實很有可能，張維屏正是通過鄒伯奇的幫助而得以避地泌沖。參陳志國、倪根金：〈鄒伯奇與學海堂述論〉，頁140。



事隨緣過，況有奇書佐酒杯。（閱《素靈微蘊》、《瀛環志略》。）（《草堂集》卷5，頁16b，總頁353）

張氏枕流高臥，<sup>56</sup> 奇書佐酒，悠哉快哉。《素靈微蘊》，黃元御（1705–1758）撰，為研究《內經》心得。黃氏為乾隆間名醫家，曾任清宮太醫，侍從乾隆帝南巡，有「一代醫宗」之譽。書中對歷代醫家多有貶詞，論者謂其「善罵」。<sup>57</sup> 張維屏通醫術，愛讀《素靈微蘊》不足為奇。

徐繼畲（1795–1873）所撰之《瀛環志略》在內容與性質上與《素靈微蘊》迥異。徐繼畲的《瀛環志略》與魏源（1794–1857）的《海國圖志》被譽為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世界歷史著作，十九世紀中葉亞洲地理圖書之集大成者。<sup>58</sup> 《瀛環志略》成書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10卷，14萬餘字，42幅地圖。書中除《皇清一統輿地全圖》及朝鮮、日本地圖外，帶有述論文字的40幅地圖乃該書之精粹。卷首有地球正背面圖，全書以四大洲五大海劃分當時的世界；各大洲地圖外，洲內重要國家有分國圖，多摹自西方地圖冊。《瀛環志略》網羅近80國，述介其地理位置、歷史變遷、經濟、文化、風土人情。徐繼畲以一半篇幅敘述歐美國情，並探論西方國家富強之道，如以商立國、議會及民主制度等，此對後來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都產生了影響，是晚清變革圖強、維新思潮的思想養分。後來，梁啟超（1873–1929）將此書列入其《西學書目表》。<sup>59</sup>

其實，魏源的《海國圖志》張維屏也有，是作者數年前寄贈予他的（張、魏二人為舊識）。1845年，張氏〈魏默深進士（源）書來，以所著《海國圖志》見寄，賦此奉報，即題卷端〉云：

憶曾握手向京華，別久書來豁眼花。氣壯群推魏無忌，心孤誰識賈長沙？九州縮地憑揮翰，四海披圖當泛槎。太息繞朝謀不用，為君一讀一長嗟。（《花地集》卷3，頁21a，總頁285）

<sup>56</sup> 張氏於泌沖居停之所名「枕流書屋」。

<sup>57</sup> 參張登本：〈《素靈微蘊》述要〉，《陝西中醫函授》1988年第3期，頁7；楊枝青：〈黃元御《素靈微蘊》醫案探微〉，《中醫文獻雜誌》2014年第2期，頁24–27。

<sup>58</sup> 鄒振環在「晚清非體制化地理學共同體」的概念下討論了此二書的編撰、內容、傳播及影響，見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1911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312–22。

<sup>59</sup> 可參潘振平：〈《瀛環志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頁65–87。

林則徐在粵禁煙，曾命人編譯英人休·慕瑞 (Hugh Murray, 1779–1846) 所著《地理百科全書》(*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集成《四洲志》書稿。鴉片戰爭失利，林被遣戍伊犁，臨行前將書稿付託魏源，囑其編撰行世。魏以林之書稿為基礎，搜集更多材料，一年後成書，初版50卷，於揚州刻印。張維屏收到的贈書，應是此1843年初刻50卷本。後來，該書又增補為60卷本及100卷本。初版《海國圖志》建基於林則徐近九萬字的《四洲志》，收集、編製了75幅沿革、世界、區域和國家地圖。在增訂版中，魏源補充了西方各國多種文獻，用八章「志書」(佔全書九成篇幅)述介各國的地理、歷史、政治、經濟、軍事、科技，乃至天文、地球、宗教、文化、教育、風土，以及各國戰艦、火器火攻、異國文字、貨幣、中國與西洋紀年表等。<sup>60</sup>

張維屏披覽魏源《海國圖志》，賦詩寄贈作者，有聯曰「九州縮地憑揮翰，四海披圖當泛槎」。「九州四海」，傳統語詞，泛指中國全境，然此時張氏所興「乘槎浮於海」之思，乃自觀《海國圖志》而來，則其所欲漫遊之海，乃世界「四洲」之海洋也，可見張氏對域外世界之嚮往。

讀徐繼畲《瀛環志略》同年，張維屏製作了一個玩物，其〈四海團扇(有序)〉云：

古之四海，就近言之，實亞細亞一洲之地耳。今之四海，東則大東洋，西則大西洋，南則南冰海，北則北冰海。蓋合亞細亞、歐羅巴、阿非利加、亞墨利加四大洲言之。余參考諸家圖志，命門人謝子輝於團扇上繪為一圖，名之曰《四海團扇》，因題一律。

山河芥子納，海曾衣袖收。(蘇詩：「袖中有東海。」)即今圖以扇，自古地如毬。絲忽分千里，團圓合四洲。《瀛環》真善本，(謂徐松龕中丞所著《瀛環志略》。)萬國入雙眸。(《草堂集》卷5，頁23a，總頁357)

張維屏命門人繪世界四海圖於團扇上，此事大妙。團扇圓形，就是地球形狀，地球正背面，正可繪於團扇的兩面。(《瀛環志略》卷首有地球正背面圖，張也許從那裡得到靈感。)詩人將近八十歲，不太可能「泛槎」四海了，但執此「四

<sup>60</sup> 可參梁啟章、梁迅：〈《海國圖志》的地圖學價值與現實意義〉，《地球信息科學學報》第18卷第1期(2016年1月)，頁49–56；王瑞成：〈從《海國圖志》看「海國」與「中國」概念的生成——全球、海國和國際關係格局中的「中國」定位與新主體意識〉，《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2期，頁73–85。

海團扇」，他大可朝夕臥遊其間。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四海團扇〉的詩及序展露了一個新的觀看及認識世界的方式，《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西學圖書明顯對張維屏產生了影響。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觀以「中國」為「天朝」，乃宇內中央，合該萬國朝中，諸夷俯首。現在張維屏確實——通過仿真的世界和列國地圖——看到，「古之四海，就近言之，實亞細亞一洲之地耳」，中國無非是亞洲 (Asia) 各國中之一國，「今之四海」實有東南西北四大洲，而羅布其間者，「萬國入雙眸」。伴隨著這種新的地理知識的增加以及「目驗」的認知，「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的文化優越論可能會有所改變，而「華夷」、「中外」等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心態也可能會有所調整。

### 稻粱難為謀，洋米濟貧

張維屏從泌沖回到廣州時，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烽火稍歇 (英法聯軍要到 1857 年底才再兵臨城下)，但中國眾多地區在經歷太平軍之亂，生靈塗炭。1857 年，友人自北京寄詩問候，張氏作詩酬答，其〈符南樵孝廉自都中寄詩見懷，賦此奉答〉云：

兵甲星霜換，江湖雨雪侵。知心難會面，異地宛同岑。著述關文獻，(君輯《正雅集》以繼沈文愨《別裁集》，已輯二千五百餘家。)精神貫古今。節勞與加飯，淺語即良箴。(《草堂集》卷 5，頁 16b，總頁 353)

「節勞與加飯」，語淺情深。「加飯」云云，本是尋常語，但張氏此際下此二字，卻啟人諸多聯想，蓋其時在廣州，「加飯」可能不是那麼容易。本年三月，張維屏有〈十三日，譚壽康少尹(本仁)，招同黃香石舍人(培芳)、羅崧生封翁(應)、喻少白參軍(福基)、陳鹿莘孝廉(廷輔)、譚玉生郡博(瑩)、崔靄堂孝廉(廣祥)、李子黼學博(長榮)，集賞雨樓展上巳)〉云：

望雨心方切，來登賞雨樓。幾時真共聽，(元人有《聽雨樓詩卷》。)此屋可忘憂。(司空《詩品》：「賞雨茅屋。」)兵甲尚未息，稻粱難為謀。(米價日昂。)娛情借觴詠，禊事且重脩。(《草堂集》卷 5，頁 18b，總頁 354)

「兵甲星霜換」、「兵甲尚未息，稻粱難為謀」，「米價日昂」，日子難過。上巳修禊，一眾文士登賞雨樓雅聚，張維屏賦詩，卻言及米貴，真有點掃興，亦可知「稻粱」之事，如今非比尋常。

先宕開一筆。話說張維屏等人此番雅集，又衍生出另一樁風雅之事來。近今流傳一件30開60頁之書畫冊頁，名為《羅觀察天池繪譚少尹壽康賞雨樓圖詩畫冊》，前為新會人羅天池（六湖，1805–1866）所繪《賞雨樓遠眺圖》，後有題記6篇，各體詩100首，俱為咸豐年間廣州文士修禊雅集的詩書畫作品。此一冊頁，洵近世廣東文物極富特色之一種，而此一文化、文學、藝術佳話，即發端於張維屏等詩老是次丁巳雅會。<sup>61</sup>

詩畫冊上有張維屏〈賞雨樓詩序〉（此文《張南山全集》失收，當係佚文，彌足珍貴），備述此次聚會的因緣及賞雨樓命名之由來，對我們瞭解上述張維屏詩的內容及寓意大有幫助。文曰：

梁有行雨山，庾開府銘之；唐有賞雨茅屋，司空表聖品之；宋有喜雨亭，蘇東坡記之；元有聽雨樓，黃鶴山樵王叔明圖之，倪雲林、張伯雨諸人題之。雨之可貴可愛也，由來久矣。吾友譚子壽康，一字博泉，築樓於廣州府治之西，經始於丙辰〔1856〕冬，落成於丁巳〔1857〕春。軒窗玲瓏，几榻整潔，近玩花木，遠瞻雲山。是皆樓之常，無足異。所可異者，時方春耕，望雨甚亟，茲樓甫成，甘雨適霑。於是譚子邀朋讌集，遂以「賞雨」名之，同人為詩詠之，譚子彙而刻之，屬余序之。且夫稼穡維寶，非雨不生，百穀豐登，非雨不成。樓以賞雨名，非徒文士之娛，而農夫之慶也。非徒宴樂之會，而大有之占也。余故樂為之序。自今以往，歲歲甘雨，歲歲賞雨。茲樓之詩，將篇帙日增而未有艾，則是編特始基之美云爾。至卷中之詩，各言其志，觀者知之，無庸辭費也。咸豐七年三月既望，番禺張維屏序。<sup>62</sup>

<sup>61</sup> 可參易大經：〈譚壽康和他的賞雨樓〉，《南方都市報》，2020年8月30日，第GA10版。廣州文士的頻繁雅集，尤其是一連串近乎「報復性」的修禊活動，可視為精英文人在連年戰亂之後重拾生活樂趣以及建構廣州文化身份、主體性、記憶的積極作為。可參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pp. 176–80。

<sup>62</sup> 張維屏手書，筆者釋文。此詩畫冊2020年始現身於文物拍賣市場，圖錄見廣東崇正拍賣有限公司網頁所載「2020春季拍賣會」（Lot 0456）：<https://www.gdczpm.com/resultthtpage.aspx?st=1&id=5307&zc=3&ht=6029134>（發布日期：不詳；讀取日期：2021年11月11日）。詩畫冊上有張維屏詩，文字與後收入《松心詩集》者無異。此一詩畫冊，筆者至今尚無緣目驗、觀賞，極神往之。

詩畫冊上有另一與會者羅應(字崧生，生卒年不詳)題詩，表出眾人於「兵後」得聚斯樓之特殊意義，亦詠及廣州「久旱得雨」之事。羅氏〈丁巳三月十三日，譚壽康少尹招同黃香石舍人、張南山觀察、喻少白參軍、陳鹿苹孝廉、譚玉生郡博、崔靄堂孝廉、李子黼光祿，集賞雨樓展上巳，遲潘蓮舫太史、鄧蔭泉中翰、李長江守戎不至〉云：

聞道春城裏，蕭條萬象秋。誰知兵後客，得聚雨中樓。福地能超劫，耆英幸伴遊。小園煙水趣，召約訪問鷗。(諸君約到小園澄清塘餞春。)(其一)

海內張平子，(謂南翁。)人間李謫仙。(子黼有仙才之目。)風流同此會，少長集群賢。座右銘真好，(樓四壁俱鐫座右銘。)山陰序定傳。(南翁、玉翁均有序。)況逢甘澍足，(久旱得雨。)萬戶慶豐年。(其二)<sup>63</sup>

賞雨樓主人譚壽康(1805–1884以後)<sup>64</sup>則於數年後另一春禊之集有〈庚申〔1860〕閏三月十三日賞雨樓展上巳後序〉，內云：「前者丁巳三月，五羊米價極昂，望雨甚急。適約諸公展禊，酒罷，大雨，米價頓減。今此會亦復如是。曰賞雨者，與人同憂，即與人同樂，而不徒光景流連也。」<sup>65</sup>

讀上述諸家題辭及詩，知咸豐七年丁巳春，廣東亢旱不雨，稼穡維艱，米價飆漲。同年五月，張氏有一「詩史」力作，<sup>66</sup>即其名篇〈荔灣行〉，云：

五羊城西西復西，荔灣綠水連清溪。年年五月熟荔支，千顆萬顆丹砂垂。憶昔乾隆至嘉慶，海國梯航海波靜。消夏樓船絡繹來，納涼士女嬉遊盛。道光時世少兵戈，依舊中流畫舫多。紅粧似仿江雲宴，白雨如催〈白雪歌〉。由來極盛難為繼，食少人繁易生事。江左猶聞狐兔藏，粵西又報蝸塘沸。皖豫頻年苦旱傷，廣州西水害秋

<sup>63</sup> 見廣東崇正拍賣有限公司網頁所載「2020春季拍賣會」圖錄，筆者釋文。

<sup>64</sup> 此生卒年據易大經〈譚壽康和他的賞雨樓〉一文考證。

<sup>65</sup> 李長榮、譚壽衢輯：《庚申修禊集》，清咸豐十年(1860)省城龍藏街萃文堂刻本，收入陳建華主編：《廣州大典》第57輯集部總集類第26冊(總第505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頁13a(總頁460)。

<sup>66</sup> 張氏〈二月初七日，梁福草比部(九圖)，招同金醴香員外(菁茅)、吳星儕孝廉(炳南)、黃竹虛千戎(銓)、倪雲隴上舍(始達)、何澹如茂才(又雄)、令姪洛舫茂才(思溥)，集梁園〉中「傷時敢謂詩為史」句後有夾注云：「近作〈羊城〉詩，見者目為詩史。」見《草堂集》，卷5，頁25a–b(總頁358)。知時人已譽張氏此詩為「詩史」。

糧。天運盈虛劫運出，烽火未已加凶荒。桑梓救人憑粥賑，(城鄉連月施粥。)話到他鄉猶可憫。人肉傷心煮作羹，樹皮果腹呼為粉。(煮人肉為羹，取樹皮作粉，俱見邸鈔奏摺。)畢竟皇天本至仁，今年暘雨喜調勻。早禾大熟能安眾，洋米多來好濟貧。世間何物無成敗，石上佛身不長在。(海珠寺有石刻吳道子畫觀音像，聞去冬毀壞。)海珠臺榭化飛煙，何況昌華渺千載。唐荔園空剩短牆，(邱園。)景蘇園在亦荒涼。(李園。)眼中百萬田田葉，歲歲新荷滿舊塘。野懷蕭散無拘束，不聞主人來看竹。雪閣三層矗海天，(潘園雪閣，可以遠眺。)田園十畝環溪屋。(葉墅名小田園。)已卜餘生見太平，(用放翁句。)九重宵旰念蒼生。四朝老叟無知識，但解詩吟擊壤聲。(《草堂集》卷5，頁20a-b，總頁355)

張維屏此一歌行體長詩，賦詠五羊城(廣州)及他地人民在「烽火未已加凶荒」下的悲慘生活(甚至有「煮人肉為羹」之事)，感人至深，值得探論的地方很多，此處暫且聚焦在其言及廣州之「食」、「米」此一關節上，其他方面，請俟他日有機會再敘。

上述張維屏〈賞雨樓詩序〉謂樓之築甫就而「甘雨適霑」，於是樓主招友讌集，並以「賞雨」命名斯樓，而據樓主譚壽康憶述，諸公於賞雨樓展襖，「酒罷，大雨」。二人所記天降甘霖的時間點不無矛盾之處(此或為文人「為情造文」，或為二人記憶有誤，此等情況，古今所在多有，亦不必深究)，但雨的確下過，〈荔灣行〉也謂「今年暘雨喜調勻」，此應無疑。既然如此，〈荔灣行〉為何又有「早禾大熟能安眾，洋米多來好濟貧」之句？要言之，如今廣東禾稻料能大熟，米價頓減，為何還得祈求「洋米」多多來，俾能濟貧？

原來，廣州米荒，除了上述詩文提及的原因(戰亂、自然災害)以外，背後還有一些更引人深思的問題存在。先從「由來極盛難為繼，食少人繁易生事」說起。張維屏此數語閒閒道來，實則涉及當時中國一個極大的危機——人口問題。十八世紀的中國，總的來說，天下太平，人口至少翻了一倍，這個趨勢一直延續到1850年(亦即太平天國之亂於1851年爆發以前)，<sup>67</sup>而僅在1779-1850年間，人口就增加了56%。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中國人口已達4.3億左右，<sup>68</sup>而

<sup>67</sup> 《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頁16。清代廣東的人口問題，另可參李龍潛：〈清代廣東人口膨脹的原因及影響〉，《明清廣東社會經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64-69。

<sup>68</sup> 《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頁102。

以廣東省人口密度而言，從十八世紀五十年代的每平方公里60人增加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105人。<sup>69</sup>人口增長，意味著有更多人力投入農作，但這樣一來，耕作的收穫報酬率也相對減少。<sup>70</sup>

人口壓力是全國性的問題，非獨廣東一隅有此困擾。夷究其實，因受地理環境制約，廣東稻米一直都不充裕。<sup>71</sup>嘉道間人蕭令裕(1789–1854)曾入兩廣總督阮元(1764–1849)幕，耳聞目睹廣東的情況，於1826年前後撰成〈粵東市舶論〉，述及廣東米糧之事頗詳：

粵東濱海之區，耕三漁七，幅員遼闊，民食不敷，歲仰廣西桂、柳、梧、潯諸府之接濟，設遇粵西年荒，諸郡閉糴，則粵東米價翔貴，小民粒食維艱。惟洋米產小呂宋國〔案：今菲律賓馬尼拉〕，地在閩粵之南，土沃水膏，不耕而穫，稻米一石，值銀數錢，由海道來廣，不過六七日，粵關市舶，每載八〔入〕口。……自司樞者專利自封，多不以此為便，奉行日久，舊制漸湮。嘉〔慶〕十一年〔1806〕以後，續來米舶，粵關止予免鈔，飭令空船出口，由是夷商無利，來米頓稀。道光四年〔1824〕，總督阮公奏請各國夷船，專運洋米來粵，免其丈輪船鈔，所運米穀起貯洋行糶賣，原船載貨出口，一體徵收稅課，得旨准行。一時黃埔、澳門，歲增米十餘萬石。然各

<sup>69</sup> 馬立博：《虎、米、絲、泥：帝制晚期華南的環境與經濟》，頁306。

<sup>70</sup> 《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頁19。此外，十九世紀上半葉，天氣異常寒冷，廣東地區的糧食生產大受影響。人口對土地的壓力也導致大片森林的消失、動物棲息地和生態系統的毀滅，以及眾多物種的滅絕。參馬立博：《虎、米、絲、泥：帝制晚期華南的環境與經濟》，頁331。

<sup>71</sup> 例如，十八世紀三十年代前後，廣州人口約200萬，每年吃米量在700萬餘石之譜，即便廣東稻米豐登，仍需赴廣西購買100–200萬石米，以足眾食。參 Han-sheng Chuan and Richard A. Kraus, *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pp. 70–71。又有謂廣東向廣西買米，每年數量或達300萬石，參 Sui-wai Cheung, *The Price of Rice: Market Integr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Bellingham, WA: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8), pp. 83–84。再如1866–1931年間，廣東自長江流域及東南亞的暹羅、安南等地輸入的米糧，平均每年在1,000萬石以上，其中尤以來自東南亞的大米佔絕大比重。參呂紹理：〈近代廣東與東南亞的米糧貿易(1866–193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2期(1995年5月)，頁34。另可參 Seung-joon Lee, *Gourmets in the Land of Famine: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Rice in Modern Cant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12, 21–37。

國來粵米船，均係零星小販，並非資本充裕之夷，每船載米三四千石及一二千石不等，雖有出口貨物，其數不甚相懸。洋米之獲利既微，出口之稅銀仍納，所免進口鈔規，始猶抵敷關費，漸且不足取償。緣阮公入告之時，僅據縣稟議行，其乾隆八年〔1743〕寬免米船貨稅之恩旨，未經查明聲敘，是以但能導夷船之歲至，而不能使洋米之積餘，可以收效於會城，而未得推行於全省。<sup>72</sup>

蕭氏建議，廣州缺米時可輸入洋米，以蘇民困，並呼籲進一步完善洋米進口的關稅、市舶制度，為解決此問題謀一長遠之策：

本年早稻收穫，僅及六成；秋冬亢旱，晚稻不足三成。來歲青黃不接之際，即查照乾隆、嘉慶年間成案，飭商採買洋米回粵糶賣，將來平其市價，非不可轉歉為豐。而暫時舉行，究非永久之善策，似應奏援乾隆八年舊例，嗣後凡遇外洋夷船，並無別貨攜帶，專運洋米來粵，五千石以上者，免其出口貨稅十分之三；一萬石以上者，免其出口貨稅十分之五；其載米不過五千石以上者，仍照道光四年成案，止免進口鈔稅〔規〕，不寬出口貨稅，以廣皇仁，而昭限制。如此則外洋米穀進口愈多，以關市之征，資積貯之益。<sup>73</sup>

阮元治粵期間，於1824年奏請洋米入口免稅，成功招徠南洋各國米商，頗收一時之效。<sup>74</sup>嗣後十餘年間，洋米起初仍每年進口，對廣州糧食不無小補。然而，到了鴉片戰爭前後，由於種種原因，洋米來粵又諸多阻滯。

對廣東的米糧問題，張維屏其實一直都憂心忡忡，其於道光十二年（1832）前後曾作〈粵食〉，云：

<sup>72</sup> 載魏源：《海國圖志》，卷78，見《資料彙編》，頁779-80。

<sup>73</sup> 同前注，頁780。

<sup>74</sup> 米船來廣州，阮元頗得意，賦〈西洋米船初到〉一詩云：「西洋夷船來，毳毳（即呢羽毛。）可衣服。其餘多奇巧，價貴甚珠玉。持貨示貧民，其貨非所欲。田少粵民多，價貴在稻穀。西洋米頗賤，（僅有內地平價之半。）曷不運連舳。夷曰船稅多，不贏利反縮。免稅乞帝恩，（余奏免米船入口船及米之稅，仍徵其出口船貨之稅，蒙允行。以後如米船倍來，則關稅仍不短。）米船來頗速。以我茶樹枝，易彼島中粟。彼價本常平，我歲或少熟。米貴彼更來，政豈在督促。苟能常使通，民足歲亦足。（以後凡米貴，洋米即大集，故水旱皆不饑。）」見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續集，卷6，頁1100-1101。



粵東人多而米少，粵東之米，不給粵東之食，向取給於粵西。粵東米價，視粵西穀船之多寡為低昂。粵西偶苦水旱，穀船來稀，粵東即米價騰貴，人心皇皇矣。而邇來無慮是者，則以有洋米故也。洋米來自外洋，風順數日可至。粵東得此接濟，雖荒歉或可無恐。嗟乎，天之愛粵人甚矣！東米不足，西米濟之；西米不足，洋米濟之。為大吏者，體天之心，順民之情，禁關津之阻勒，懲吏胥之苛求，使穀船、米船源源而來，是備荒之善政也，是弭盜之本計也，是安粵之良法美意也。蔡忠襄公曰：「欲世治安，必先使窮百姓有飯喫。」旨哉言乎！牧民者其念諸。<sup>75</sup>

魏源於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出版《海國圖志》，於〈書暹羅國〉後云：

〔暹羅〕有播植，無耘耔，有天上〔工〕，無人力，故穀豐而賤，甲乎南海。自康熙以來，歲運洋米數十萬石以濟閩粵之民食。近以免稅，不利粵海關，故關吏陰撓之。始則售米不許置貨，繼則置貨不許免稅，於是觀望不至。<sup>76</sup>

其《海國圖志·籌海篇四·議款》又云：

考康熙、乾隆中，准商船運呂宋〔案：即今菲律賓呂宋島〕、暹羅米入口者……。自後港腳夷船援例歲運印度、新嘉坡〔案：即今新加坡〕、葛留巴〔案：即今印尼爪哇〕米入口者，不下四十萬石。多以鴉片寄躉船，而以米入口，由是粵海關裁抑之，但免入口米稅，不免出口貨稅。<sup>77</sup>

<sup>75</sup> 見陳在謙評輯：《國朝嶺南文鈔》（道光十二年廣州學海堂刊本），卷10，頁10a-b。張氏本文未署年月，檢《張南山全集·松心文鈔》，亦未收錄。《國朝嶺南文鈔》刊刻於道光十二年，張維屏卷前有小傳，謂張氏「現官同知」（見頁1a），而張維屏正於本年奉命改掣江西，署袁州府同知，故筆者暫繫此文於是年。張文後附林伯桐（月亭，1773-1844）評云：「粵東五方雜居，惟恃外米以濟，『禁阻勒』、『懲苛求』、『備荒所以弭盜』，信矣！尚有匪類遏鄉米之流道，牙儈以市米為壟斷，引伸觸類，益知此篇之指陳親切也。」（見頁10b）復有陳在謙按語云：「予始錄南山文，未嘗及此篇。昨坐客談羊城米價，曰幸有洋米，不然且大昂矣。然後知此文不可少也。」（見頁10b）觀此數人之言，益可知廣州食米問題一直存在，以及洋米接濟之重要。

<sup>76</sup> 載魏源：《海國圖志》，卷8，見《資料彙編》，頁938。

<sup>77</sup> 同前注，卷2，見《資料彙編》，頁936。

從上述阮元、蕭令裕、張維屏、魏源等人分別於十九世紀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年代所為詩文可見，二次鴉片戰爭前後三、四十年間，廣東米糧一直存在問題，而諸人都寄望輸入洋米，以紓民困。不幸的是，就總的趨勢而言，十九世紀以後，廣州的對外及出洋貿易由於粵海關嚴查盤剝、十三行商人經營困難、戰亂頻仍、清政府於水陸要道設置重重關卡，已經一落千丈。<sup>78</sup>至張維屏於1657年賦詩時，正值英法聯軍才炮轟過廣州沒幾個月，張氏殷切盼望「洋米多來好濟貧」，但洋米一時不敢或不願意來，也可想像而知。（事實上，洋米大量渡海而來，發生在張維屏逝世七、八年後，他的願望終於達成，而其時中外國際關係亦進入一個新的局面。）<sup>79</sup>

廣東稻米不足，原因還不只上述的這些。有不少廣東人不安份，根本沒在種米，他們大種甘蔗或經營桑基魚塘。這是早期全球化 (early globalization) 商業行為的結果。十八、十九世紀，商人大批量地把廣東的蔗糖銷往長江三角洲，以倒買江蘇、湖北的棉花，經過紡織，再向南洋出口棉布。利字當頭，廣東的輪耕作物中，甘蔗每每取代了稻米。用於種植稻米的土地越來越少，產量銳減，廣東不得不向其他省份購買。<sup>80</sup>與此同時，中國絲綢產量激增，這是因

<sup>78</sup> 雖然如此，仍有數量可觀的洋米輸入廣東。魏源《海國圖志·籌海篇四·議款》曾提到鴉片戰爭爆發前數年之道光十七年，廣州與「英夷」及「彌利堅國」（即美國）貿易的貨品及所涉金額。交易貨品內有廣東自英人購入的洋米21萬石，共費238,000員（應即西洋銀元）。同年，廣東向美商購入洋米860,000員。魏源在這一筆交易下沒有列出石數，若然英商與美商售予廣東的米價相若，則可推知在76萬石左右。易言之，1837年廣州自英美商購入約97萬石洋米。載魏源：《海國圖志》，卷2，見《資料彙編》，頁933-34。英美的洋米是從東南亞各國買入再倒賣到中國的，非其本國所產。

<sup>79</sup> 清朝各時期閩粵等省向東南亞各國購買稻米的情況，可參余思偉：〈清代前期廣州與東南亞的貿易關係〉，《中山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頁73-83；陳希育：〈清代前期中泰大米貿易及其作用〉，《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87年第2期，頁56-59、49；呂紹理：〈近代廣東與東南亞的米糧貿易（1866-1931）〉，頁33-77；喻常森：〈明清時期中國與西屬菲律賓的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1期，頁43-49。相關官私文獻，可參陳鴻瑜編註：《民國以前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料編註》（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8年），第3、4冊。

<sup>80</sup> 馬立博：《虎、米、絲、泥：帝制晚期華南的環境與經濟》，頁168-72。另可參Francesca Bray, *The Rice Economies: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p. 128, 131-34。彭慕蘭也從十八世紀中葉中國「日常奢侈品」

為東印度公司售賣鴉片橫財就手，現在可以大肆購買絲綢以滿足海外需求。生絲有價，農民貪財，不再種植稻米。廣東人主要是用擴張桑基魚塘（池中養魚，池埂種桑）的生產方式以提高絲綢產量。和農作物轉變為甘蔗一樣，魚塘面積的擴大是以種米土地的減少為代價的。<sup>81</sup>總而言之，農業商業化的結果使得農民不再是與其他農民相聯繫，而是與地區性、全國性，乃至世界性的市場綁在一起。珠江三角洲的農民生產運往華中市場的甘蔗和出口到歐洲市場的絲綢，而自己的口糧則依靠東江、北江和西江流域的腹地地區供應。<sup>82</sup>

綜上所述，由於先天和後天的種種原因，廣東稻米本來就不足，近百年來又「食少人繁」，現在更因太平軍之亂，不少內陸運輸路線受阻，廣州斷了「米路」——其他地區也因戰亂、自然災害而減產，供應緊張——米價焉能不昂？<sup>83</sup>這也許才是張維屏詩所謂「兵甲尚未息，稻粱難為謀」背後更為真實的情況。也難怪張維屏說「桑梓救人憑粥賑（城鄉連月施粥）」，地方官紳施賑，也只能派稀粥。另一方面，廣州吃的大米，不但從鄰省購買，也從東南亞各國進口。此時國內連年戰亂，烽煙四起，遇上凶年饑歲，民情洶洶，南洋大海也許真是一條救命的「活路」。但洋米來粵，似乎也不是那麼容易。我甚至懷疑，南洋船舶現在根本不能來，因為1856年底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兩廣總督葉名琛下令關閉海關，一直要到英法聯軍以「聯合委員會」的名義統治廣州以後，停頓了將近一年半的港口貿易才於1858年2月重啟。張維屏於1857年賦詩之時，正值廣州封關。（當然，走私出入境素來是廣東及南洋各國民人之能事，我們也不排除貨船偷摸進港的可能性。）

〔上接頁34〕

消費的角度對甘蔗的種植情況有所考察，見《大分流》，頁111-13。明清時期廣東地區種植的整體情況，另可參李龍潛：〈明清廣東經濟作物的種植及其意義〉，《明清廣東社會經濟研究》，頁1-20。

<sup>81</sup> 馬立博：《虎、米、絲、泥：帝制晚期華南的環境與經濟》，頁177-79。

<sup>82</sup> 同前注，頁187。

<sup>83</sup> 如張氏前此數年有〈甲寅〔1854〕冬至後十日，聞東路米船為賊阻截，民食維艱，感而賦此〉云：「朝聞一語劇堪嗟，載米船多被賊遮。與粟有誰分五秉，輜飢何止說千家？檢方辟穀終難辟，努力加餐豈易加？簞食未來且瓢飲，可容烹茗對梅花。（適長眉道人送梅花來。）」見《草堂集》，卷4，頁26b（總頁341）。詩所詠者，即運米入粵水路因戰亂受阻，廣東人有「努力加餐豈易加」之嗟。

## 五、尾聲：島夷、鬼兵、花舫

其時也不是只有鴉片、銅臭在亞洲流通，有比較文雅的事物。在書寫上述數詩的同一年，張維屏有〈越南國人鄧廷誠，奉其國主之命來粵購書，並索余詩集，因書絕句示之〉一詩，云：

自古南交已宅斯，（今越南即古交趾。）後來銅柱界華夷。島夷人異心無異，也愛中華書與詩。（《草堂集》卷5，頁24a，總頁357）

「島夷」國主賞愛己詩，遣人來求詩集，這事讓張維屏頗為得意（此前已有高麗、琉球、米利堅讀者訪購其詩集）。<sup>84</sup>他在給這位越南來人寫的絕句中，在「也愛中華書與詩」的文化情感中消解了華夷之辨的必然性。（在亞洲「漢字文化圈」中，這種比較溫情但不無驕傲的交流歷代有之，也不足為奇。）

相對而言，「英夷」（以及其他「歐夷」）卻不可同日而語。西方列強現在的時代精神是自由貿易、帝國擴張（所以後來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而恃著船堅炮利，得以橫行於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中東。中國人的文化能量、話語邏輯在義理與交涉上無法與之構成真正的對話與協商（negotiation），儘管英人也不無愛好「中華書與詩」的。從此看來，廣東人築堅壘、辦民團、練火炮以抗禦外國人（以及盜匪）其實相當務實，也很勇敢——朝廷紊亂，官兵怯弱，地方腐敗，人民還能指望誰？——最終落敗，只因雙方火力太過懸殊（若論壯丁數量，絕對不輸洋人）。<sup>85</sup>

1857年12月底，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城。<sup>86</sup>1858年1月，「聯合委員會」成立，開始統治廣州。此後不久，張維屏有〈新年入城〉一絕云：

<sup>84</sup> 張氏門人李長榮序張氏詩集，特別提到這些殊榮。見《松心詩集》，頁1b（總頁121）。

<sup>85</sup> 魏源在當時也說過：「……既款之後，則宜師夷長技以制夷。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載《海國圖志·籌海篇三·議戰》，卷2，見《資料彙編》，頁927。廣東紳士中，不無敢作敢為之人，如：「……而番禺紳士潘仕成捐貲延佛蘭西洋官雷壬士於家，造洋船洋礮，又造水雷，能水中轟破船底。所捐造二桅戰艦四艘，材堅工巧，悉如西洋式。每水雷造價僅四十金，每艘僅價二萬金。詔廣東新造戰艦，一切交其承辦，毋令官吏經手，以杜侵蝕。大吏尼之，旋亦中止。」載魏源：《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下）》，見《資料彙編》，頁1004。

<sup>86</sup> 英法聯軍炮轟廣州城，陳澧因作〈礮子謠二首〉，呼籲國人及早覺醒，詩云：「礮子來，打羊城。城裏城外皆礮聲，礮聲一響子到地。打牆穿打瓦碎，輕者受傷重者

〔下轉頁37〕

十家九戶閉柴荆，白晝巡街有鬼兵。八十老人談異事，廣州城裏少人行。（《草堂集》卷5，頁25a，總頁358）

張維屏見證的是廣州「舊秩序」的窮途末路，以及一個「新秩序」（a new order）詭異的開張。這些「鬼兵」（英法海軍陸戰隊）和中國警察將共同維護廣州城和近郊的治安近四年。在此期間，1858年7月，廣州民團曾進攻廣州城，被英炮兵擊退。1859年1月，700名英國海軍陸戰隊隊員逼近民團總部，團勇以炮火攻擊之。英方派遣1,300名步兵和6艘炮艦增援。雙方交戰三日，英軍最後佔領並燒毀了民團總部及其所在的村莊。<sup>87</sup>

沒多久，廣州民眾開始習慣英、法聯軍的管治。據說，佔領結束時，長期深受土匪、內亂和政府橫征暴斂之苦的珠江三角洲農民，對外國佔領帶來的和平局面表示感謝。<sup>88</sup>張維屏沒看到這個結局，他在1859年10月撒手人寰，享年八秩。

老詩人傳世最後數詩錄如下。〈戊午〔1858〕秋，第九孫兆鼎年十三中北闈副榜，賦詩勉之，並示四孫兆甲〉云：

不學張童子，當師李鄴侯。弱齡登副榜，壯志慕千秋。忠孝為根本，詩書助進脩。聯科相砥礪，（兆甲前科中式。）兄弟即朋儔。（《松心詩錄·二編》卷1，頁8a，總頁412）<sup>89</sup>

〈讀《武備志》書後〉云：

〔上接頁36〕

斃。老夫中夜起長歎，尋思礮子何由至。礮子之來自外洋，外洋人至由通商。通商皆由好洋貨，鐘鏢絨羽爭輝煌。鐘鏢絨羽人人喜，誰知引出大礮子。吁嗟乎！礮子來，君莫哀。中國無人好洋貨，外洋礮子何由來？」（其一）「請君莫畏大礮子，百礮纔聞幾人死？請君莫畏火箭燒，徹夜纔燒二三里。我所畏者鴉片煙，殺人不計億萬千。君知礮打肢體裂，不知喫煙腸胃皆熬煎。君知火燒破產業，不知喫煙費盡囊中錢。嗚呼！太平無事喫鴉片，有事何必怕礮怕火箭？」（其二）見《陳東塾先生詩詞》，頁55-56。

<sup>87</sup> 《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頁241。

<sup>88</sup> 何偉亞：《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頁39注1引述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研究。

<sup>89</sup> 張維屏：《松心詩錄·二編》，清道光咸豐間刻《張南山全集》本，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33冊。

聖人戰則克，文事兼武備。仁者必有勇，道一本無二。雖然理不殊，事則判道藝。茅君有心人，著書關國計。（書為茅氏元儀所輯。）總目別以五，（一曰兵訣評，二曰戰略考，三曰陣練制，四曰軍資乘，五曰占度載。）為卷二百四。考史既淹通，繪圖復精細。七政占天文，九州度地勢。足食籌軍糧，足兵利戎器。立志在必傳，成書頗不易。鰕生有一言，行軍古今異。大砲（礮，此書作砲。）數千斤，在昔無此制。砲中復藏砲，砲至即火至。突如其焚如，不暇論勇智。此書有可觀，致遠思將泥。得人法誠良，失人法亦蔽。神明存乎人，書固不可廢。跋尾言無文，率意作五字。質諸學博翁，（書為陳蘭甫學博所藏。）妄談勿予詈。（《松心詩錄·二編》卷1，頁8b，總頁412）

〈戊午十二月十九日，鄧蔭泉中翰（大林）、李子黼學博（長榮）招同喻少白參軍（福基）、許蓉裳通守（文澄）、趙勉之司馬（惟濂）、潘鴻軒茂才（恕）、錢子瑞上舍（芝生）集杏林莊拜坡公生日，有感而作〉云：

杏林莊裏壽筵開，奇石香花佐酒杯。四大皆空公宛在，八旬猶健我能來。當時北宋全無土，此日南溟有劫灰。太息華夷難界限，海氛飛到妙高臺。（蘇詩：「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松心詩錄·二編》卷1，頁9a，總頁412）

〈新年（有序）〉云：

己未〔1859〕正月初六日，放船花埭，遊諸園林，見百卉欣欣向榮，而連日嚴寒，大有江北雪天風景。牡丹數十盆，猶含苞斂萼，以待晴暄。入春以來，今日始瞻麗日。遊人皆有喜色，不特百鳥和其聲以助管絃也。晚飲花舫，同集者陳蘭甫學博（澧）、鄧蔭泉中翰（大林）、許星臺水部（應鑠）、李子黼光簿（長榮）、錢子瑞上舍（芝生）。主人余門人趙勉之刺史（惟濂），記之者珠海老漁張（維屏）也。新年八十話康疆，頑健從來不杖鄉。（余從不扶杖。）飯罷或行千百步，酒酣常讀兩三行。（每日飲酒必讀書。）幾時華夏消夷患，何日乾坤息戰場？世事艱難春事盛，且偕良友看群芳。（《松心詩錄·二編》卷1，頁9a-b，總頁412）

此數詩者，張維屏於英法聯軍統治廣州約一年內之作也。風景不殊，劫後山河還在，花地依舊飄香，只是坐中人已經不完全是「舊秩序」的人了。

也許可以說，是廣東海口的炮火轟開了廣州文士的眼界，深刻地改變了他們的世界觀。八十老翁張維屏依然心繫國防武備。他讀陳澧所藏明末人茅元儀

(1594–1640)所輯《武備志》，題長詩於後，讚賞其書內容膽富，但對其是否適用於今日卻不無疑慮。張維屏著眼於「行軍古今異」，但標舉的例子卻非用兵、戰略之事，而是古今武器的差別。如今的大砲重至「數千斤」，且「砲中復藏砲，砲至即火至」，已遠超明末時的水平了（中國對火炮並不陌生，在十七世紀的明清交戰中，雙方都曾兇狠地用上從葡萄牙人那裡傳來的「紅夷大砲」）。<sup>90</sup>從明末茅元儀於1621年編成《武備志》，到張維屏於清末題詩於書後，二百多年過去了，期間「滿夷」崛起，明亡清興，而到如今，大清帝國又已如落日西頹。此二百餘年間，西方的科學技術突飛猛進，而中國卻停滯不前。清末士人遇上的是千年未見之大變局，廣州文士如張維屏、陳澧等更親自見識過「西夷」砲火的厲害，難怪張維屏發出「此書有可觀，致遠思將泥」的勸告。奢談無益，空想誤事，面對現實，趕緊製造（或採購）足以禦敵的火器大砲才是要緊之事，<sup>91</sup>而張維屏強調「得人」，此等人才，恐怕還得要「開眼看世界」，也要通曉近代火器軍事的「道藝」。

世界丕變，西學東漸，廣東瀕海地方得風氣之先，不甘為人後，文士的思想與術業也與時俱進。然而，有些習慣、性情、愛好，對他們來說，化沾肌膚，習與性成，無論世界如何變化，都是始終不渝的，例如「中華書與詩」，以及相隨的生活美學、「習性」(*habitus*)。我們記得，1858年伊始，「聯合委員會」開始統治廣州。7月，廣州民團曾試圖攻擊城中的英法駐軍。廣州時有緊張局面，不難想見，而其年秋闈，廣東士子依舊入試，以謀仕宦之途。張維屏第九孫兆鼎名落孫山，只中副榜。張氏賦詩慰之，勉其再接再厲。顯然，張維屏對子孫的科舉表現、仕宦出身密切關心，儘管他知道，這個國家的文官體系已百孔千瘡。

<sup>90</sup> 可參黃一農：〈明清獨特複合金屬砲的興衰〉，《清華學報》第41卷第1期（2011年3月），頁73–136。黃文第四節為「鴉片戰爭之後製造的複合金屬砲」，對我們瞭解清人於鴉片戰爭前後所擁用的鑄砲技術及舉措大有助益，見頁94–112。

<sup>91</sup> 如魏源就認為，中國自己製造不切實際，趕緊向洋人購買方是上策，說：「造礮不如購礮，造舟不如購舟。……力省而器精，事半而功倍。前年粵東購夷礮二百位，有重至九千斤者，惜主款徹防，遂棄諸虎門之洋。……蓋夷礮夷船但求精良，皆不惜工本，中國之官礮，之戰船，其工匠與監造之員，惟知畏累而省費，礮則並渣滓廢鐵入爐，安得不震裂？船則脆薄窳朽不中程，不足遇風濤，安能遇敵寇？」載《聖武記·軍政篇》，卷14，見《資料彙編》，頁980。

要是科舉是相對庸俗的文事文場，也有比較儒雅風流的，如廣州文士頻繁的詩酒唱酬。張維屏六十歲以後詩，唱和之什甚夥，多緣於雅集酒會，上錄張氏傳世最後數詩，末二題即為雅集產物。〈戊午十二月十九日……集杏林莊拜坡公生日〉一詩，是所謂「壽蘇會」之作。壽蘇會者，每年臘月十九日，文人紀念大文豪蘇東坡誕辰之雅集也，源起於宋代，明清時期大盛，甚至傳至日韓，乃「中華書與詩」文化圈內共同的實踐與佳話。<sup>92</sup>廣州文士此會，「奇石香花佐酒杯」，自是賞心樂事，而張維屏高唱「八旬猶健我能來」，其快意亦可感知。廣州目下的歷史處境成就了張詩絕妙之一聯——「當時北宋全無土，此日南溟有劫灰」。末聯「太息華夷難界限，海氛飛到妙高臺」云云，亦瀟灑著時代滄桑之慨。<sup>93</sup>張氏此詩不刻意求工，而於平易處見折疊，古今映襯，樂中見哀，坡公生日遂與十九世紀的鴉片戰爭、廣州歷史產生了突如其來的聯繫，實在妙不可言。

上文述及，廣州為英法聯軍所陷後，老人有〈新年入城〉一詩，謂見「鬼兵」巡街，偌大廣州省城，家家閉戶，路無行人，氣氛甚是詭異。張維屏己未（1859）新年之作，則大異其趣。似乎「鬼兵」巡街，不無值得稱道之處，地方上恢復了秩序，人們開心過年。詩之前序頗長，暢言與友於新正初六日「放船花埭，遊諸園林」之種種樂趣。眾人邊賞花邊聽鳥，且見「遊人皆有喜色」，其樂也融融矣。遊罷，樂未央，張維屏與陳澧等「晚飲花舫」——廣州花舫，是有名妓侑酒、歌姬獻唱的（清末集中在現今東堤一帶）。老人詩上半自誇身體猶健，能飯，愛飲酒，仍然讀書。詩下半有「幾時華夏消夷患，何日乾坤息戰場」一聯，稍露傷感，但隨後一聯振起作結，說「世事艱難春事盛，且偕良友看群芳」，大有世事難卜，聽之可也，際此良辰佳日，我輩且自開懷之意。張維屏生命的最後二十年，經歷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亂、第二次鴉片戰爭，確乎「世事艱難」。詩人關懷國是，心繫桑梓，其賦詠戰爭、動亂、時事之作，無愧「詩史」，是其對時代、歷史之「見證」（witnessing，亦傳統所謂「詩人

<sup>92</sup> 可參衣若芬：〈時間·物質·記憶——清代壽蘇會之文化圖景〉，《長江學術》2016年第4期，頁57-69；池澤滋子：《日本的赤壁會和壽蘇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sup>93</sup> 張氏此聯後有夾注，引蘇軾詩句揭明「妙高臺」意象之所由出，實則此聯亦脫自明清之際廣東詩人陳恭尹（1631-1700）〈崖門謁三忠祠〉之名句：「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見陳恭尹著，郭培忠校點：《獨漉堂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37。



之義」也)，履行著「文學」對國家、歷史、人民的責任。戰爭掙紮野蠻，社會躁動不安，人心惶惶，日子難過。際此情景，張維屏難說處之泰然，但他的心靈沒有枯涸，這是因為他有詩、書、史、字畫、知識的滋養，潤澤無聲，安攝心神。此外，也許在今天看來，昔時文人雅集唱酬，率多無聊，也無多少名篇留傳後世，但我們要知道，雅集遊讌是文人自我調息及凝聚社群感 (a sense of community) 的重要機制，也是技藝得以試手、展演的場合，是文人「必要之惡」 (a necessary evil)。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而文以會友，友由知己，友以輔仁，怡情適志——這不正是「文學」對其「群」的回饋和護持麼？

一切不是彷彿終而復始麼？在本文開首「張維屏辭官歸里，安居花地」一節，我們讀過張氏的〈春日同陳蘭甫(澧)、金芑堂(錫齡)兩孝廉泛舟花地，飲於東園，席上得句〉(1837)、〈三兒、四姪、六兒連舉於鄉，詩以示之〉(1839)二詩，其乃張維屏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前夕之作。在1837年那詩中，有「對酒喜逢三益友」、「美景良辰共尋樂」之句。二十多年後，又值春日良辰，張維屏依舊「放船花埭」，「偕良友看群芳」，而鄉晚輩陳澧一直都在老人身邊，思之溫馨。至於1839年之詩，乃子姪輩鄉試中式，張維屏賦以誌喜之作。廿載以後，世上新人趕舊人，該張維屏的孫子輩進場了。科舉制度要到1905年才終止。1858年這一榜，張維屏孫兆鼎失利，三年後他會捲土重來，<sup>94</sup>只是到時候，成功與否，張維屏都不會賦詩賀之或勉之了。

我在上文說過，也許是廣東海口的炮火轟開了廣州人的眼界，而我想，是廣州花地上的花、鳥、詩、酒、人給予了張維屏在「世事艱難」的日子裡偶爾愉悅開懷的力量。然而，花地好像也不太一樣了。廿載以前，張維屏在〈花地〉中高詠：「花地接花津，四時皆似春。一年三百六，日日賣花人。」歲月美好。而到如今，老人再言及花地，有語云：「……而連日嚴寒，大有江北雪天風景。」此語竟似不祥之兆——張維屏的孫子兆甲、兆鼎一輩，正走進清帝國回天乏術的窮冬。

<sup>94</sup> 後兆甲於1865年中進士，兆鼎於1877年中進士。

## 徵引書目

### 一、專書

-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卜正民 (Timothy Brook)、若林正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編，弘俠譯：《鴉片政權》，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
- 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編：《粵詩人彙傳》，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9年。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1輯第2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
- 孔飛力 (Philip A. Kuhn) 著，謝亮生、楊品泉、謝思焯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修訂版。
- 王國斌 (R. Bin Wong) 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 伊懋可 (Mark Elvin) 著，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譯：《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
- 池澤滋子：《日本的赤壁會和壽蘇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 何偉亞 (James L. Hevia) 著，劉天路、鄧紅風譯：《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 李長榮、譚壽衢輯：《庚申修禊集》，清咸豐十年 (1860) 省城龍藏街萃文堂刻本，收入陳建華主編：《廣州大典》第57輯集部總集類第26冊 (總第505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
- 李龍潛：《明清廣東社會經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擘經室續集》，收入《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金青茅編：《張南山先生年譜撮略》，清咸豐間刻本，收入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36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

- 馬立博 (Roberts Marks) 著，王玉茹、關永強譯：《虎、米、絲、泥：帝制晚期華南的環境與經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
- 張維屏：《松心文鈔》，清道光咸豐間刻《張南山全集》本，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3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松心詩集》，清道光咸豐間刻《張南山全集》本，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33冊。
- ：《松心詩錄·二編》，清道光咸豐間刻《張南山全集》本，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33冊。
- 陳永正：《嶺南詩歌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
- 陳在謙評輯：《國朝嶺南文鈔》，道光十二年(1832)廣州學海堂刊本。
- 陳恭尹著，郭培忠校點：《獨漉堂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
- 陳憲猷等標點：《張南山全集》，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994年。
- 陳澧著，汪兆鏞纂輯，汪宗衍續補：《陳東塾先生詩詞》，香港：崇文書店，1972年。
- 陳鴻瑜編註：《民國以前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料編註》，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8年。
- 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 著，史建雲譯：《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
- 程中山：《清代廣東詩學考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
-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
- 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劉廣京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 黃佛頤編纂，仇江、鄭力民、遲以武點注：《廣州城坊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
- 黃剛：《張維屏詩文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
- 黃國聲：《張維屏》，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
-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1911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劉禾 (Lydia H. Liu) 著，楊立華等譯：《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

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修訂版。

錢仲聯編：《清詩紀事·道光朝卷》影印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

Bray, Francesca. *The Rice Economies: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Cheung, Sui-wai. *The Price of Rice: Market Integr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Bellingham, WA: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8.

Chuan, Han-sheng and Richard A. Kraus. *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Lee, Seung-joon. *Gourmets in the Land of Famine: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Rice in Modern Cant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Miles, Steven B.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 二、論文

王瑞成：〈從《海國圖志》看「海國」與「中國」概念的生成——全球、海國和國際關係格局中的「中國」定位與新主體意識〉，《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2期，頁73-85。

安海波：〈晚清「光與成像」：嶺南鄒伯奇的攝影理論與實踐〉，《裝飾》第286期，2017年2月，頁142-43。

衣若芬：〈時間·物質·記憶——清代壽蘇會之文化圖景〉，《長江學術》2016年第4期，頁57-69。

余思偉：〈清代前期廣州與東南亞的貿易關係〉，《中山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頁73-83。

呂紹理：〈近代廣東與東南亞的米糧貿易(1866-193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2期，1995年5月，頁33-77。

巫仁恕：〈逃離城市：明清之際江南城居士人的逃難經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3期，2014年3月，頁1-46。

易大經：〈譚壽康和他的賞雨樓〉，《南方都市報》，2020年8月30日，第GA10版。

張美娟：〈論嶺南詩人張維屏的詩歌創作特徵〉，《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7卷第2期，2012年2月，頁32-35。

- 張登本：〈《素靈微蘊》述要〉，《陝西中醫函授》1988年第3期，頁7。
- 張靜：〈張維屏思想析論〉，《嶺南學》第2輯，2008年12月，頁1-13。
- 梁啟章、梁迅：〈《海國圖志》的地圖學價值與現實意義〉，《地球信息科學學報》第18卷第1期，2016年1月，頁49-56。
- 陳永標：〈試論嶺南晚清文學的基本特徵和情感意向〉，《嶺南學》第5輯，2013年12月，頁110-21。
- 陳希育：〈清代前期中泰大米貿易及其作用〉，《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87年第2期，頁56-59、49。
- 陳志國、倪根金：〈鄒伯奇與學海堂述論〉，《廣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頁135-42。
- 喻常森：〈明清時期中國與西屬菲律賓的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1期，頁43-49。
- 黃一農：〈明清獨特複合金屬砲的興衰〉，《清華學報》第41卷第1期，2011年3月，頁73-136。
- 戴門勇：〈略論鄒伯奇在中國近代科技史上的地位〉，《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5期，2011年9月，頁82-87。
- 楊枝青：〈黃元御《素靈微蘊》醫案探微〉，《中醫文獻雜誌》2014年第2期，頁24-27。
- 潘振平：〈《瀛環志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頁65-87。
- 謝飄雲：〈鴉片戰爭前後開拓詩壇新風的兩位傑出詩人——張維屏與龔自珍詩歌創作比較〉，《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頁37-45。

### 三、網絡資料

- 《羅觀察天池繪譚少尹壽康賞雨樓圖詩畫冊》圖錄，廣東崇正拍賣有限公司「2020春季拍賣會」(Lot 0456)：<https://www.gdczpm.com/resultthtpage.aspx?st=1&id=5307&ztc=3&ht=6029134> (發布日期：不詳；讀取日期：2021年11月11日)。

# 鴉片、鬼兵、珠海老漁：晚清廣東詩人張維屏 鴉片戰爭期間所作詩管窺

(提要)

嚴志雄

在中國近代史上，廣州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中國與列強的衝突，也最常發生在廣州。本文在晚清世變日亟的時代背景下，探論一系列晚清廣東大詩人張維屏(1780–1859)創作於兩次鴉片戰爭期間的詩篇。張氏傳世詩二千餘，琳琅滿目，而本文所關注者，在其致仕歸鄉後之作。張氏辭官以前之詩，多模山範水、觴詠花月、宴遊唱酬、感懷身世之屬，而其六十歲後的一些作品，則與時代的重大歷史事件息息相關，在內容及技巧上都起了新變。張維屏集詩人、文人、學者、官員、士紳諸身份於一身，在兩次鴉片戰爭期間多有創作，敢於任事，是考察晚清文士/知識分子的思想、情感、生命經驗的極佳個案。

本文在詮釋策略上有一新嘗試。張維屏詩集大致以年月先後編次，本身就呈顯著一部「生命史」，可以循之展開一個以張氏視界為導向的「賦義」進程。本文將依據相關文本原來的次序展開閱讀，盡量不作調動，藉著字詞所指點、提示的方向、情景，進入特定的歷史片段，再循之而尋繹時代更大的歷史場景，以之闡發張維屏的所思所感，同時也展開歷史、文化、文學層面上的詮釋。

**關鍵詞：** 張維屏 晚清 廣州 鴉片戰爭 詩歌 生命史

# Opium, Foreign Devil Soldiers, and the Old Fisherman on the Pearl River: A Study of Zhang Weiping's Poems Revolving around the Two Opium Wars

(Abstract)

YIM Lawrence C. H.

As a southern port city and the capital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Canton) found itself at the epicenter of cultural and social changes and a battlefield between the declining Qing empire and aggressive foreign powers in late Qing times. This paper explores a series of poems composed by the celebrated Cantonese poet Zhang Weiping (1780–1859), who has,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earned a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Poetry” for his verses revolving around the two Opium Wars.

Zhang produced some two thousand poems over his long lifetime. Although brilliant and elegant, Zhang's pre-Opium War poems are typical of that of traditional literati art and culture. Many of his works in the 1840s and 1850s during the times of the Opium Wars, in comparison, are infused with historical and social nuances. These later poems of Zhang's are the primary subject matter of this study. Zhang Weiping was at once a poet, a literatus, a scholar, an official, and a member of the local gentry.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poems furnish us with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observe how late Qing literati intellectuals responded to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the internal disintegration and foreign influences.

The present author interprets Zhang's poems through both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lenses, but does not subject the texts to rigid thematization and totalization. Zhang's poems are represented chronologically over time to make way for a signification process in which Zhang's state of mind and way of seeing the world are exemplified. Subsequent discussions are situated within the broader universe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historical events and the pertinent problems and scenarios of Guangdong.

**Keywords:** Zhang Weiping late Qing Guangzhou Opium Wars poetry  
life History